

第五章 國家認同對兩岸關係的影響

或有論者認為，在全球化（globalization）下，國家認同會逐漸的變化面貌，甚至放棄對本身國家認同的堅持，逐漸融入地球村的一員，但就可見的未來及現今所呈現的國際現勢看，縱使全球化推動得如火如荼，但對國家主權的堅持及對所屬國家認同力量仍佔據不可忽視的地位，所以有學者以放棄國家部分主權最顯著的歐洲共同體，決不是已經簡單的成爲一個國家，而猶如是「在一棟大樓內，住戶仍各自保有自己公寓的所有權」

（condominium）做爲證據；¹也有學者以簡略的形容詞表現當前認同的再起，如 Ernst B. Haas 就認為，六〇年代由冷戰概念支配，七〇年代被通貨膨脹及石油危機佔據，八〇年代我們歡迎冷戰結束及全球自由貿易商人橫行，到了九〇年代卻是民族主義的十年，²更有學者指出，到目前尚無由國家認同轉變成對超強國際組織認同之證據，反而有證據顯示，國家認同較過去還要強烈，³所以有國內學者認為：「正是全球化帶來民族主義的回溯，也正是現代化帶來了本土化的復興，雖然從長遠看全球化和現代化的兩股勢頭，並非相容而是深深的相互滲透，但實際過程中，卻往往是兩者的激烈撞擊而不斷引發文化民族的情緒」，⁴因爲對於所屬文化民族與他族的區隔的執著，自然引發不同族群、文化的認同，並進而引發制度認同的區隔，由此三者的相互糾結，國家認同的存在，雖在全球化浪潮中，仍未見絲毫的消退，更何況，早自孔德（Comte）提倡現代化理論，馬克斯主張「國家消亡論」（withering away of the state）至今，國家認同的感情亦未曾稍減，⁵而全球化所帶來的人口暴增、難民流竄等問題，各國又強調本身的國界與

¹ Anthony D. Smith, *National Identity* (Las Vegas: University of Nevada, 1991), p. 153.

² Ernst B. Haas, *Nationalism, Liberalism and Progress* (New York: Cornell University, 1997), p. vii.

³ Anthony H. Birch, *Nationalism and National Integration* (Boston: Unwin Hyman, 1989), p. 223~224.

⁴ 郭洪紀，台灣意識與中國情節（台北：慧明，2002），頁 37~38。

⁵ Smith, *National Identity*, p. 145.

主權，顯然與全球化的趨勢不同，⁶這種對於國家認同的堅持，在兩岸關係中更是受兩岸的強調，而堅強無比。

國家認同包含有「族群認同」、「文化認同」與「制度認同」三個層面已如前述，台灣也自領導人蔣中正、蔣經國的「漢賊不兩立」、「一個中國」以降，到李登輝的「本土化」，再到陳水扁的台灣獨立於中國之外的政策推動下，台灣的國家認同也由「一個中國」的國家認同，向李登輝時代調和非主流派與新黨的統一立場及民進黨的獨立立場，主張追求「未來中國的統一」，⁷一切以台灣優先，再到陳水扁直接表明追求「一邊一國」立場的方向推動，這種推動方向，對於兩岸關係的影響自然不在話下，由各階段的轉變可看出兩岸關係的變化，也可彰顯國家認同因素在兩岸關係理論建構中的重要地位。

第一節 國家認同轉變的趨勢

事實上，國家認同的轉變，在很大的程度上是依據對於台灣國家定位的重新調整所發展出來的現象，台灣的國家定位，受主政者所追求國家定位與未來目標不同的影響極深，主政者常以主政的優勢地位，動用龐大國家資源，在制度、文化及族群形塑的領域中「教化」台灣住民，使得台灣住民對國家認同，也隨著時空與主政的意識型態不同，而有著大幅度的改變。

一、制度認同的轉變趨勢

學者李筱峰認為，從歷史背景上看，清朝割讓台灣與日本的百年前起：先有「台灣民主國」，雖號稱「自立為國」，卻仍在「遙戴皇靈」「戀

⁶ Smith, *National Identity*, p. 156.

⁷ Cal Clark, "Taiwan's Democratization and Political Transformation Toward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and Beyond", in Winston L. Yang & Deborah A. Brown, eds., *Taiwan and Mainland China Toward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New York: St. John's University, 1998), pp. 13~14.

戴皇清」「氣脈相通，無異中土」。所標榜的獨立只是抗日的手段，其目的並不在於真正建立新國家。日據時代前二十年內的武裝抗日行動，更有主張為「統」而戰，或為「獨」而戰的不同立場，但絕大部分都不具備近代民族運動的性格。日據中期，二〇年代的社會運動雖然已經發展出台灣人意識，不過在當時的運動者們所考慮的「台灣人意識」，只著眼在如何擺脫日本殖民統治，至於擺脫之後台灣應該歸屬中國，抑或獨立，似乎就不是當時的運動者所在乎的課題。戰後的「統」「獨」爭論，會形成強烈的對立，主要是過去那個共同抗爭的對象----日本殖民統治者----結束了，而一九四九年之後的台海兩邊又形成分隔的局面，「統」「獨」問題的思考變成實質的「中國」與「台灣」之間的「分」「合」關係的思考。在「台灣獨立」的陣營中，二二八事件後興起於海外的台灣獨立運動，有極明顯以國民黨統治當局及外省人為獨立的對象；但是到了八〇年代後期，因國民黨「本土化」成功，及中國大陸對台灣的壓抑使得台灣住民形成生命共同體的感覺等等，台灣獨立運動，則轉以中共為獨立的對象，不再以國民政府及「外省人」為對象。在「統」派方面，少部分自五〇年代起即抱持「反資本主義」「反帝國主義」的社會主義人士，他們自始即主張台海兩邊應該「統一」。他們還曾經在白色恐怖時代遭受到同樣主張「統一」，但以「反共」為職志的國民黨人的壓制。然而時序進入九〇年代，隨著台灣獨立聲音的公開化、隨著台灣住民中贊成台獨的人數日增，所謂「外省人的危機感」甚囂塵上，過去兩股意識型態迥異的「統」派，開始有合流的跡象。過去在蔣氏時代聲稱「反共」的人，紛紛放棄反共，並且有人開始與北京當局互通。⁸但應該注意的是，互通或許是追求統一之表態，並不代表所有與中國大陸「互通」者，就是無原則的贊成大陸併吞台灣。

⁸ 請參閱：李筱峰，「一百年來台灣政治運動中國家認同」一文，張貼於：<http://www.jimlee.idv.tw/art0107.htm> 網站

換言之，在台灣歷史發展的過程中，除去割讓與日本初期的抗爭時期，台灣住民亟思與大清朝再度合併，不願接受日本人所加諸的政治制度，及自一九四九年之後的兩岸制度競爭，僅少數台灣共產黨人贊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政治制度安排，願意接受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統治外，在國民黨政府的統治下，台灣多數時間與多數住民，都反對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政治制度安排合併，也因此，在國家認同的「制度認同」一環，兩岸始終處於對立的階段，而這種對立，在漫長的歲月中又概略可加以分類，以顯現不同時空環境下的變化趨勢：

（一）、全面否定中共期

兩蔣時代，以捍衛中華民國憲法自居，並視中共為叛亂團體，以漢賊不兩立的立場，全面否定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政治制度安排，以做為中華民國在國際社會與對內統治合法性的基礎。依據學者張亞中的論述，這一時期雖總體呈現與中共尖銳對峙的局面，但事實上在台灣內部也漸進的呈現對中共態度的變化，以理論加以歸類就呈現如下走向：

1、內戰理論的堅持：

內戰理論源於交戰團體（belligency）或叛亂團體（insurgency）間的國際法規範，但雙方都主張本身為唯一合法政府，一九四九年內戰後的中華民國就持這種主張。⁹在表現上是以「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為最極至，認為中華民國是唯一合法的政府，中共是叛亂團體，但不被國際社會接受，最終於一九八七年廢除「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後，正式放棄這一理論。¹⁰在內戰理論堅持時期，如，一九五〇年三月二日，蔣中正復行視事，表達鞏固台灣基地光復大陸決心。一九五五年二月五日，駐聯合國大使蔣延黻公開反對兩個中國論，蔣中正並於同年七月二日、十四日及一九五六年十月二十七日公開表示不接受兩個中國觀念。一九

⁹ 張亞中，兩岸主權論（台北：生智，1998），頁 57～58。

¹⁰ 張亞中，兩岸主權論，頁 77。

五八年五月二十五日，蔣中正宣稱反攻大陸是弔民伐罪的革命戰爭等等，¹¹都是自然的選擇與作為。

2. 完全同一理論的接受

指分裂國家其中一方主張其主權及憲法效力涵蓋對方，與被分裂的國家「同一」具有完整的國際法人地位。¹²

中華民國政府在一九七二年增額中央民意代表選舉前，係持「完全同一理論」界定兩岸關係的，認為中華民國的疆界及憲法效力及於中國大陸；直到一九九一年四月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完成第一階段修憲，增訂國會全面改選法源起，才將此一觀點完全放棄。而內戰理論及完全同一理論，是冷戰下的產物，中華民國的主張，從未被國際社會所普遍接受。

13

3. 國家核心理論的成形

或稱「縮小理論」，指分裂國家中的某一方主張，雖然目前的管轄地區縮小但卻主張我有國家的核心地位，與原來的國家是「同一」的，其國際人格不應該被改變，所承認變動的部分僅有治權縮小不是主權的縮小。

14

在蔣經國時代的一九七二年第四次修訂「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時，為因應台灣地區社會發展需要，授權總統訂頒新法充實中央民意代表機構，不受憲法第二十六、六十四及九十一條的限制，明訂「自由地區增加中央民意代表名額定期選舉」，在實質上，為未來長期國家分裂的狀態做出準備，後續在國際上中華人民共和國逐漸取得優勢，及台灣內部民主化的壓迫，使當政者逐漸務實的認定台灣的治權僅限於臺、澎、金、馬地區，雖然仍有國家統一綱領、「一國兩區」、「一國兩府」等等宣示性的政

¹¹ 請參閱第二章相關論述。

¹² 張亞中，兩岸主權論，頁 59。

¹³ 張亞中，兩岸主權論，頁 78。

¹⁴ 張亞中，兩岸主權論，頁 61。

治語言，但實際上，國家核心理論已經被當時的主政者運用於台灣對大陸政策的國家自我定位之中。¹⁵

（二）、獨立台灣萌發期

台灣獨立的主張與推動，在台灣脫離日本殖民重返中華民國主權範圍內後，就逐漸醞釀發生。

李登輝進一步於一九九一年修憲將中華民國憲法界定於台、澎、金、馬地區適用，並將權力來源侷限於台、澎、金、馬地區人民，廢除代表傳統中國政治制度安排的台灣省等等，取消戒嚴、戡亂，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合法的統治權力，更將台灣的政治制度設定為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平等的地位，主張兩岸政治制度的區別與認同應相互尊重。在兩岸關係中的主權自我訂位的理論上就遞變成「分割理論時期」。

「分割理論」係指國家領土的一部份被分離出去後取得國際法主體地位（中華人民共和國），但不影響及被分離國家的法律地位（中華民國）。

16

李登輝於一九八八年接替蔣經國為中華民國總統後，強烈主導台灣地位的重新界定，對於兩蔣時期面對中國大陸使用「內戰理論」、「完全同一理論」及「國家核心理論」，宣稱主權涵蓋中國大陸的不務實說法表示不滿，逐漸轉為以分割理論來自我定位，將台灣自中國大陸分割出來，並以獨立自主國家自許，這從一九九四年中華民國外交部的「參加聯合國說帖」中，主張不挑戰中國在聯合國的席位及追求未來中國的統一，與一九九六年「參與聯合國說帖」強調台灣尋求在聯合國中有適當的代表，卻並不尋求代表全中國等等，可以得到證明。¹⁷為了符合台灣與中國大陸是兩個國

¹⁵ 張亞中，兩岸主權論，頁 79～84。

¹⁶ 張亞中，兩岸主權論，頁 63～64。

¹⁷ 張亞中，兩岸主權論，頁 85～89。

家的相對位置，對內就自然衍生出修憲、凍省並宣布兩岸至少是特殊國與國關係等制度變遷的作為。¹⁸

（三）、獨立自主鞏固期

陳水扁執政時期，主張兩岸是「一邊一國」互不隸屬，並於二〇〇三年底起，進一步要求以公投修憲方式，逼近台灣正式宣佈獨立，最後迫使偏向統一的國民黨、親民黨聯盟總統參選人連戰，也於二〇〇三年十一月十五日公開表示，「由人民公投決定中華民國的新憲法，將透過修憲程序完成並施行」，¹⁹在陳水扁於二〇〇四年連任成功後，於三月二十九日接受美國華盛頓郵報外交新聞主編David Hoffman、駐北京特派員Philip Pan專訪時表示：對於中共的一個中國政策，不是我個人不接受，而是二千三百萬台灣人民都沒辦法接受一國兩制，這次的大選，本人之所以能夠從四年前的百分之三十九點三的得票率，成長到今天的百分之五十點一，我相信最重要的一個因素，就是台灣主體意識的覺醒與抬頭。²⁰於四月一日接受日本讀賣新聞專訪時也說，他所主張的一邊一國關係已經成為台灣社會絕大多數人的意見，²¹依陳水扁的觀點，正凸顯民意贊成中華民國政治制度的安排，可進一步與中華人民共和國進行區隔的現象。

陳水扁依恃其得票數的增長及主觀上追求台灣獨立的意願，在其主政下，自然將台灣的國家認同帶往更獨立的一方，此時在學理上已進入分解理論時期，分解理論是指一個國家因戰爭、國際條約或協定，分解為兩個以上主權國家，原有國際人格消失，²²民進黨政府顯然是將台灣與大陸的主權定位以「分解理論」的方式處理，就是進一步將傳統的「中國」完全

¹⁸ 請參閱第三章相關論述。

¹⁹ 請參閱第四章相關論述。

²⁰ 請參閱總統府網站：

http://www.president.gov.tw/php-bin/docset/shownews.php4?_section=3&_rid=9519網站之專訪全文。

²¹ 聯合報，中華民國九十三年四月二日，版 A13。

²² 張亞中，兩岸主權論，頁 63。

「分解」掉，堅決的主張台灣與大陸是對等的兩個國家，因此兩岸關係又是另一番局面。

依據各時期主政者在面對主客關因素下對於大陸的自我定位，可明顯的發現，台灣的自我定位，是由追求統一光譜的一端，向追求獨立的一端遞移，不同階段不同的立場，就出現不同的制度變革與認同。

基於兩岸自一九四九年以來的爭鬥與隔閡，李登輝以降的領導人，對於台灣民眾的國家認同轉變教化，在「制度認同」層面上，只消順應兩蔣時代的基礎稍做調整，進而改變「制度認同」中有關「正溯」與兩個對等國家的「質」就可達到既定的目的，有論者就率直的指出，因台灣的地位與生存意義和收復大陸的國策是接連起來的，先前反對運動人士發動群眾對國民黨「反攻復國」的立國精神進行挑戰，對中華民國憲法所代表的法統進行質疑，就是挑戰台灣的現有地位，且企圖發覺台灣在國際上作為一個獨立國家的特殊意義與價值，而台灣有這種氣魄的產生，是由於台灣內部已經在實質上創造了一些他以為自傲的價值，²³也因此，只要挑戰國民黨的「憲法法統」與「反攻復國國策」，就可堂而皇之的進行制度認同的轉變及提倡台獨，這種基於長久以來與中共進行對抗為基礎的，由爭「法統」、「正溯」，轉成根本放棄「法統」與「正溯」的競爭，變成制度認同的競爭，這種競爭與認同相對於對「文化認同」與「族群認同」的扭轉確實是要容易許多。

再檢視民意對於中華民國制度認同的狀態，可發現台灣民意對於當前台灣制度的認同程度，比對中共的政治制度認同程度高出許多，以中共長久以來以對台工作的重要政策「一國兩制」為例，台灣民眾對於中共「一國兩制」政策的理解，大抵不脫：所謂「一國」縱然不一定是指「中華人民共和國」，但也絕不會是指「中華民國」，所以接受「一國兩制」的民意

²³ 石之瑜，當代台灣的中國意識（台北：正中，1993），頁 75。

變化，在某種程度上將是對中華民國這個制度的否決，也就是「制度認同」層面的轉變；反之，不支持「一國兩制」的民意表現，在某種層面上，正好代表著對現有中華民國制度的支持，及對中共制度強加於台灣的否決，（雖然獨派人士或有在未來建立新的制度認同的企圖，但現階段卻是以接受中華民國制度作為未來否決中華民國制度的基礎）所以，檢驗台灣民眾在制度認同層面上的轉變，可以看出台灣民眾對於制度認同的轉變情形；依據國內對於民眾支持「一國兩制」與否的各項民調，其結果差異極大，經進一步相關研究發現，台灣民眾對於「一國兩制」支持的程度，常取決於對「一國兩制」後台灣所擁有各項條件好壞，而條件的好壞，也常由民調問題有意無意的暗示、明示所決定，由政大選研中心，在二〇〇二年所做研究就發現，不同的問題內容，民眾所表現出對於「一國兩制」的支持程度竟然有極大的差別：

表 5~1 2002 年一國兩制支持度

問卷題目	接受	不接受	無意見
如果台灣與大陸雙方協議，「一國兩制」保證50年不改變；也就是台灣的經濟及生活模式在50年內都不改變，請問您能不能接受這樣的「一國兩制」？	35.2	48.0	16.8
如果「一國兩制」的一國不叫中華人民共和國，也不叫中華民國，就是一個新國號，叫做「中國」，請問您能不能夠接受這樣的「一國兩制」？	33.7	49.7	16.6
如果台灣接受「一國兩制」以後，台灣可以擁有自己的軍隊，但是不能再向其他國家購買所需要的武器，請問您能不能夠接受這樣的「一國兩制」？	14.4	73.0	12.6
如果台灣接受「一國兩制」以後，台灣民眾不能自由地直接選總統，請問您能不能夠接受這樣的「一國兩制」？	7.5	82.3	10.2
如果台灣接受「一國兩制」以後，台灣不能夠跟其他國家建立官方的外交關係，請問您能不能夠接受這樣的「一國兩制」？	7.0	78.5	14.5

如果台灣接受「一國兩制」以後，北京政府可以決定台灣某些法律無效，請問您能不能接受這樣的「一國兩制」？	5.6	75.4	19.0
--	-----	------	------

資料來源：政治大學選舉研究中心，2002年，電話訪問。（樣本數：1,115）。轉注自：陳義彥、陳陸輝著，「模稜兩可的態度還是不確定的未來：台灣民眾統獨的解析」，頁10，該論文發表於民國91年12月20日，在台大社會科學院國際會議廳所舉辦「兩岸關係：變遷、定位與策略」研討會中。

這個民調結果透露出一個趨勢，那就是台灣民眾大部分不能接受「一國兩制」的制度設計，而不接受「一國兩制」所代表的意義，合理的推斷應該包含有獨派的「台灣已是一個新而獨立的國家」，及統派中主張「光復大陸」這一股勢力的意涵，這兩類支持者，以經驗上看卻也完全符合台灣現有民意，顯然，在時序二00二年時，台灣民眾在不分離統、獨支持者的情況下，對於台灣現行與大陸不相隸屬的「中華民國」制度的認同仍然是偏高，對於毀棄對現有制度的認同，轉而對大陸制度的認同，並與大陸進行合併的機會，在現有台灣住民對於政治制度的認同中並不高。

(四)、進一步發展趨勢

另一個角度看待台灣民眾高度支持中華民國與大陸區隔的制度認同問題，就是台灣自一九四九年與大陸分離迄今，台灣執政者，在中華民國體制下，不斷的政治宣傳教育的結果；台灣民眾在兩蔣時代視中國共產黨統治下的大陸為叛亂地區，在解嚴以後，台灣民眾逐漸視中國大陸為另一個與中華民國對等的管轄地，在主張台獨的民進黨執政後，更進一步將制度的認同自兩蔣的「正朔」之爭，轉變為國家對國家的對等競爭，因此，一九四九年以來，台灣民眾在制度認同面上的表現，一直就是不認同大陸政治制度，這種表現自兩蔣以來已是一貫的傳承，雖然其中對於認同有「質」的轉變意涵在內。

國內學者江宜樺的觀點與筆者不謀而合，江宜樺認為過去十幾年來台灣所經歷的政治變動，使台灣成為一個「想像的政治共同體」大致已經成形，台灣人認為他們的疆界有限，疆界內的住民可以彼此想像為國人同

胞。²⁴這種認同，江宜樺甚至進一步認為是「新國家運動」，所謂「新國家運動」是台灣在自由化與民主化後，台灣朝野政黨與人民大眾對於國家內涵再界定運動，這個運動包含有中央民意代表全面改選、總統副總統直選、宣告動員戡亂結束、承認中共對中國大陸的治權、修改中央政府憲法架構、改變中央與地方層級關係、推動加入聯合國、界定兩岸為特殊國與國關係等等，這個運動又與民進黨或建國黨所推動的建國運動不同，²⁵換言之，這種國家制度認同與大陸的分離並進行認同的轉變與確定，自兩蔣時代就已產生，但與直接要求獨立於大陸之外的建國訴求有「質」上的不同。雖然在質上有追求台灣獨立，或以台灣為獨立國家再視情況追求獨立或統一的區別，但認為台灣是一個主權獨立，並對其擁有的政治制度認同不斷加強，卻是當前無法違逆的大方向。²⁶

由制度認同的趨勢分析，可明顯的看出兩岸政治制度分離的逐步明確，及引發兩岸政治制度認同各自分離與強化的趨勢。

二、族群認同的轉變趨勢

在台海兩岸的統獨爭議中，族群認同的分離常作為主張獨立者的有力訴求，所以，國內台獨理論學者施正鋒認為，台灣民族與中華民族的分、合，對於一個中國或兩個國家有相當程度的決定性作用，施正鋒以圖表表示了如此的關係：²⁷

表 5~2 族群認同變遷下兩岸的可能分合

	一個國家	兩個國家
兩個民族	中國併吞台灣	台灣共和國（一台一中）
一個民族	中國（一國兩制）	中華民國（一中兩國）

²⁴ 江宜樺，「新國家運動下的台灣認同」，林佳龍等主編，民族主義與兩岸關係-哈佛大學東西方學者的對話（台北：新自然主義，2001），頁 207。

²⁵ 江宜樺，「新國家運動下的台灣認同」，頁 208。

²⁶ 請參閱第四章有關連戰、宋楚瑜有關贊成修憲、三權分立等等論述。

²⁷ 施正鋒，「台灣人的國家認同」，台灣歷史學會編，國家認同論文集（台北：稻香出版社，2001），頁 174。

簡單的說，就是台灣民族與中華民族劃分的確立，就是兩個國家關係的基礎，也就是兩岸關係變化的起頭。而陳水扁在「施政白皮書中」認為：「一九八八年初，一代強人蔣經國病逝，隨之而來的是長達十二年的李登輝主政時期，在這段時期，李登輝大力推動台灣的本土化，也正是台灣自由化與台灣民族主義更緊密結合的時期。這種結合，並無助於台灣民主政治的鞏固，卻鞏固了國民黨政權。因為，一個在台灣實行高壓威權統治近四十年的國民黨政權，自由化後卻憑藉台灣民族主義繼續掌權，絕不可能對舊體制進行大開大闔的改革。而台灣始終無法落實政黨輪替，使台灣民主政治機制的建立更遲滯不前。」²⁸現今政黨輪替已經實現，或許在民主的鞏固較過去更叫人放心，但不可否認的是台灣民主與自由主義，卻更加緊密的與台灣民族主義結合，使得台灣領導者，可挾政治社會化力量，透過民主與自由主義的模式，教化台灣人民加速形塑「台灣民族」，並與大陸上的「中華民族」進行區隔；但 Percy B. Lehing 認為，因為國家的形成不應該以種族為單一基礎，所以種族應排除在分離主張的正當性之外。既然種族在自由民主主義或共和國理論中沒有政治地位，他就不能作為脫離國家組織的正當性基礎。²⁹族群認同的區隔或「民族主義」充其量只能作為行使自決權後，確保主權完整的重要因素，³⁰換言之，若僅僅以「台灣民族」與「中華民族」的不同，作為主張台灣分離出去，另行獨立成為一個國家的正當性理由上，顯然難以被世人普遍接受，必須外加「制度認同」及「文化認同」才能形塑成一個比較周延的國家認同，而以國家認同的轉變作為分離或統一的基礎，在主張分

²⁸ 「施政白皮書」原文刊載於總統府網站：
http://www.president.gov.tw/1_president/subject-04b.html

²⁹ Percy B. Lehing，許雲翔、江佩娟、葉錦娟、劉中文等譯，分離主義的理論（Theories of Secession）（台北：韋伯，2002），頁 12。

³⁰ Lehing 著，許雲翔等譯，分離主義的理論（Theories of Secession），頁 91。

離或統一的理論上才更具說服力，但不可否認的，民族主義卻是獨立的重要因素，尤其是在台灣國家認同的轉變過程中。

西方學者認為，政治菁英以族群認同作為動員支持者向敵人爭取權力的有效工具，³¹又說種族（ethnic）為民族國家（nation）的核心，³²依此論點，台灣在經歷蔣氏父子、李登輝到陳水扁幾個時期，因為對於國家地位認同及國家未來目標的設定不同，自然全力推動族群認同的轉變，以支持自身的政治目的，檢視台灣自蔣氏遷台至民進黨執政期間，約略呈現如下的轉變趨勢：

（一）、中國人認同時期：

蔣氏父子時期，是以中國人認同鞏固台灣做為對抗中國共產黨的基地，同時企圖將中國共產黨政權與中華民族分離，再「動員兩岸的中華民族打倒共產黨政權」，對於台灣住民的族群認同，自然是以建立中華民族認同為最終的目的。

論者認為，台灣族群的認同主要在戰後國民黨來台之後才形成的，其論證的基礎是，在台灣回歸中華民國後，台灣同胞曾經熱烈歡迎中國政府的接收，但不幸卻發生二二八事件，之後，外省人又壟斷了政治權利，這樣的政治歷史背景，是台灣族群認同形成的基礎；³³檢視歷史，台灣民眾久受日本統治，喪失與統治階層在政治、經濟、法律、教育、社會地位上平等競爭機會的窘境，原寄望於台灣回歸中華民國後能夠脫離其箝制，但是代表國民黨或中華民國的外省人族群來台，不僅沒有實現台民的理想，反而取代了日本人的統治地位，讓台灣民眾渴求在政治、經濟、法律、教育、社會地位上被平等對待的願望落空，終於激起「台灣人」與「中國人」對抗的民怨，也為往後族群認同的轉變奠下基礎。

³¹ Smith, *National Identity*, p. 20.

³² Smith, *National Identity*, p. 39.

³³ 吳乃德，「省籍意識、政治支持和國家認同」，張茂桂等著，族群關係與國家認同（台北：業強，1993），頁 30~31。

(二)、台灣人認同時期

在七〇年代後期，為因應台灣內部反對運動的興起，蔣經國以「我是中國人，也是台灣人」的宣示，表達其融入台灣社會的決心，並在一九八六年三月的十二屆三中全會中，提出政治革新方案，進一步推動國民黨的「本土化」與政權的「台灣化」，以抵抗反對勢力的「國民黨是外來政權」、「中國人壓迫台灣人」等宣傳，這些作為卻成為日後李登輝所提倡的新台灣人認同的濫觴。³⁴

李登輝時期，開始逐步轉向台灣民族認同，李登輝與陳水扁都企圖建構全新的台灣族群，並進行台灣族群的認同，同時動員「台灣民族」對抗「中華民族」，尤其是李登輝、陳水扁時期的建構台灣族群的努力，是配合修憲後對於台灣（或稱中華民國）領域的確定作為下，加強與加速台灣族群（或稱「新台灣人」）的建構；依據 Roy E.H. Mellor 的說法，區別種族（ethnic）與民族（nation）在社會科學界中有用的界定，是在於種族以文化的保有為其特點，而民族則以擁有疆域與主權的國家為其特色，³⁵那麼台灣在一九九一年修憲確立中華民國管轄領域為臺、澎、金、馬等地區，並在台灣文化認同推動上與大陸進行了明顯的區隔之後，台灣執政者對於台灣族群(nation)的建構與認同的企圖已然十分明確，這種新台灣人建構的目標，當然是在追求擁有特定的疆域與國家主權。

更進一步的是，近年台灣流行以「台灣意識」的有無，作為區別「愛台」或「賣台」的標線，所謂「台灣意識」一詞，不易界定，依據郭洪紀的說法，認為「台灣意識」是以區域主義特徵為內涵，表現為「住民意識」、「鄉土意識」、「省籍意識」、「命運共同體意識」、「住民自決意識」

³⁴ 蕭敬，「淺析『省及矛盾』與李登輝的『新台灣人主義』」，夏潮基金會編，中國意識與台灣意識（台北：海峽出版社，1999），頁 682~683。

³⁵ Roy E. H. Mellor, *Nation, State and Territory, a Political Geography*(London: Routledge, 1989), p. 3.

和「台獨意識」的相互交纏，其深層意義是，台灣社會、經濟、政治取得成功後，所產生的自足與尋求國際活動空間之間的困窘的矛盾心態呈現，因為「台灣意識」以強調地域的特殊性，作為政治實體的文化根據，³⁶使得「台灣意識」進一步成為判定「新台灣人」的準繩，因此，在李登輝、陳水扁等領導者的意念中，不論是閩南、客家、外省、原住民，凡具備台灣意識者就是與中華民族可以進行區隔的新台灣人，為台灣族群認同與台灣民族的形塑奠下基礎。

（三）、台灣族群認同的進一步形塑

學者黃俊傑研析各時期「台灣意識」的轉變，認為「台灣意識」的發展可以分為四個時期：³⁷

- 1、明清時代的台灣意識只是中國地方意識的展現，如：「漳州意識」、「泉州意識」或「閩南意識」、「客家意識」等；
- 2、到日本統治期，作為被統治者台灣人集體意識的「台灣意識」才出現，這半世紀（一八九五年到一九四五年）的「台灣意識」既是民族意識又是階級意識；
- 3、一九四五年台灣光復，「台灣意識」基本上是一種省籍意識，尤其是二二八事件發生後，占多數的台灣人凝聚反抗占少數的外省統治集團；
- 4、一九八七年戒嚴令解除後，台灣民主化，使得「台灣意識」成為對抗中共政權的政治意識。

而所謂「台灣意識」更簡單的說，就是「感覺到自己是台灣人的意識」(the consciousness of being Taiwanese)，也就是「台灣認同」或是「台灣人認同」(Taiwanese identity)，³⁸對近百年來「台灣意識」面貌的描繪

³⁶ 郭洪紀，台灣意識與中國情節，頁 261。

³⁷ 黃俊傑，「論『台灣意識』的發展及其特質」，夏潮基金會編，中國意識與台灣意識，頁 2。

³⁸ 施正鋒，「台灣意識的探索」；夏潮基金會編，中國意識與台灣意識，頁 58。

中，我們或許可以發現「台灣意識」的本質，大底上是一種「抗爭」與「怕被出賣」的論述。亦即，「台灣意識」的形成與凝聚，是在反抗滿清與日本異族統治、反抗國民黨威權統治及反抗中共打壓的脈絡中，再交織著因為害怕被出賣的安全感需要，所凝聚形成之鞏固台灣主體性的「台灣意識」論述³⁹，顯然，在實際運作面上，「台灣人意識」或「台灣意識」已於近代面對中國大陸時，被賦予高度的政治意涵，隨者「台灣人意識」的不斷轉變，「台灣人意識」已經由地域性的認同轉換成認為「台灣人」與「大陸人」不同的認知，更逐漸向「台灣民族與中華民族不同」的方向轉變。其實，「台灣人意識」或「台灣民族與中華民族不同」的論點，以李登輝所提倡的「新台灣人」最具代表性，李登輝就曾對「新台灣人」的內涵做過如此的解釋：台灣最早的居民是原住民，而原住民在文化上也分成好幾個族群，至十七世紀前後，才開始有居住在中國大陸福建省和廣東省的漢民族移民來台，其後有荷蘭統治、明鄭建立政權、清朝漢民族大批移入台灣、一八九五年割讓給日本、一九四五年台灣回歸中國、一九四九年國民黨政府播遷來台，許多原居住於中國大陸各省分的人也隨之來台，帶來多元的文化和風俗習慣，經過半世紀的共同生活，塑造出今天台灣的新風貌，也讓不同的族群融合成「新台灣人」。⁴⁰所以說，「新台灣人」不是突然降生的，而是歷史「累積」的成果。⁴¹依據李登輝的意見，在歷史的累積中，台灣人已然不是單一的民族，更不是單一的漢族，而是漢族與原住民、荷蘭人、日本人等民族在文化甚至血緣上的混合所呈現的新興民族，在族群認同上，自然應與大陸的漢族做出區隔，並以具有「台灣意識」的「新台灣人」作為認同的主軸。這種認知與作為，是李登輝、陳水扁時期對於台灣族群認同推

³⁹ 請參閱：桂宏誠著，「論析台灣意識與文化認同」一文，張貼於：
<http://www.npf.org.tw/PUBLICATION/IA/091/IA-C-091-249.htm> 網站。

⁴⁰ 李登輝，台灣的主張（台北：遠流，1999），頁 267。

⁴¹ 李登輝，台灣的主張，頁 266。

動的根據。

但是在陳水扁執政一年後的二〇〇一年五月一日，台灣民眾對族群認同的表現如何？以「民眾對王永慶『台灣人也是中國人』說法、開放兩岸直航，及兩岸領導人互訪之看法」為題做出民意調查結果顯示：⁴²

二〇〇一年五月一日的台灣民意中，在「我是台灣人也是中國人」一項中所呈現的是，有近三成的民眾不同意，代表著台灣有近三成的民眾在族群認同是已經不認同中華民族；而高達七成以上的 20 至 29 歲年輕人，贊成「台灣人也是中國人」的民眾，另外高學歷者亦有「既是中

⁴² TVBS 民意調查中心，2001 年 5 月 20 日所做結果，張貼於：

http://www.rdec.gov.tw/res02/show91_055.htm 網站。其內容是：1.當問到民眾「王永慶日前表示，台灣人也是中國人，就像住在北京的人，南京的人，也都是中國人，請問您同不同意王永慶的說法」時，有六一的民眾表示同意，二成七的民眾不同意王永慶的說法，另有一成一民眾沒有意見。

2.交叉分析顯示，傾向國親兩黨的民眾，超過八成同意王永慶的說法，支持親民黨的民眾甚至八成八表示同意，傾向民進黨的民眾看法呈兩極化，四成八表示不同意王永慶的說法，但也有四成七表示同意，而政黨傾向中立者則是五成六表示同意，二成二表示不同意。

3.與年齡交叉分析發現，年齡愈輕，同意王永慶說法的比例愈高，20-29 歲年輕族群同意王永慶「台灣人也是中國人」說法的比例超過七成二。以省籍來看，不論本省外省，同意王永慶說法的比例都超過不同意的比例，本省閩南人同意王永慶說法的比例為五成六。在教育程度方面，學歷愈高，同意王永慶說法的比例愈高，大專以上教育程度者超過七成四同意王永慶的說法。以地區而言，南部地區民眾亦有五成九同意王永慶的說法。

4. 對於王永慶呼籲政府儘速開放兩岸直航，高達七成民眾表示同意，不同意的比例只有一成九。

5. 問到「請問您認為王永慶的說法是為了自己的利益還是國家整體利益」，結果顯示，四成四的民眾認為王永慶是為了自己的利益，二成四認為是為了國家利益，另二成二民眾認為王永慶的說法是為了自己利益也為了國家利益。

6.交叉分析顯示，傾向民進黨的民眾，六成七認為王永慶是為了自己利益，傾向國民黨的民眾，認為王永慶為了自己利益和為了國家利益的比例差不多，而傾向親民黨的民眾則有四成一認為王永慶是為國家利益，超過為了自己利益的比例（二成六）。

7. 至於未來兩年兩岸有沒有可能直航？民眾的看法相當紛歧，四成六表示可能，但也有四成二認為不可能。

8. 對於陳總統日前宣示希望民進黨在今年八月組團訪問大陸，高達六成三民眾表示不可能順利成行。

9.有七成民眾認為未來兩年中共領導人不可能來台訪問。

國人也是台灣人」認同趨勢，這種走向，相對的反證，似乎閩南人、學歷低、年齡偏高者較偏於台灣人與中國人不是同一族群的認知，事實上這種趨勢在一九九三年的實證研究中就已經出現：「省籍與族群認同有顯著的關連性，閩南族群更認同自己為台灣人不是中國人」、「中國人認同者是一個比較年輕的族群」及「教育程度高者自認為中國人的程度高」等現象，⁴³這種變遷或許以「統合論」(integration)所論述交往造成融合有關，或許高學歷、年輕台灣住民，比較有機會與大陸進行各項交流，所以顯現高學歷、年輕台灣住民在族群認同上比較認同「既是台灣人也是中國人」選項；另外，根據多種民意調查顯示，台灣人認同有緩步上揚現象，⁴⁴尤其是聯合報於二〇〇三年十月，所做民調顯示有高達62%的「台灣人」認同，⁴⁵雖然該項調查沒有顯示「既是台灣人也是中國人」認同數據，但綜研各家民調結果，可發現如下現象：

- 1、台灣人認同確實已經升高。
- 2、高學歷及年輕一輩，對於族群認同比較不排斥同時認同為中國人及台灣人。

這種現象的出現，是否意味著台灣地區住民中國人認同的回流，在現有資料中尚言之過早，但在以推動台灣獨立的主政者眼中，卻會認為必須加強對年輕的且具有較高教育程度的下一代，進行族群認同的再教育，才足以遏阻台灣住民認同回流為中國人認同趨勢。另一個值得注意的現象是，縱然對於中國人認同有回流現象，但整體而論，台灣對於族群認同也比兩蔣時代要更偏向台灣民族認同一方。

(四)、族群認同的未來走向

依據現有台灣族群認同的變化情形，主張國家認同必須獨立於中國

⁴³ 游盈隆，「族群認同的政治心理分析」，徐火炎等著，台灣族群政治專題（台灣政治學刊創刊號）（台北：月旦，1996），頁55～59。

⁴⁴ 依據本文第三章的論述，台灣人認同是在一九九五年七月以後穩定的超過中國人認同迄今。

⁴⁵ 請參閱第三章、第四章有關族群認同的論述。

之外的政黨，就必須以高齡、閩南族群作為「死忠」支持者，而對於這些選民大部分集中在中南部鄉村地區，以主張台獨者對這些選民最容易的訴求，當然就是以族群的劃分為基礎，因此，在每次選舉中，都可以看到以省籍劃分為競選訴求的激情以台灣南部為盛，就如同公元二〇〇二年北高兩市市長選舉所顯示的意義一般，該次選舉於十二月七日，分別在台北市及高雄市舉行，其中連任成功的民進黨籍高雄市長謝長廷獲得超過 50% 的選票，國民黨籍台北市長馬英九得票率亦達 64.1%，分別連任成功，而謝長廷在競選期間身陷收取新台幣 450 萬的不當利得風暴中，且扁政府在執政兩年期間，經濟表現極差，選前更有十二萬農民為農會改革與中央對立上街遊行、教師為爭取權益上街遊行、工人為降低失業率、降低健保費率上街遊行等等社會運動，且高雄市的失業與經濟蕭條狀況比台北還嚴峻，國民黨陣營也以政府施政成效不佳作為攻擊競選對手的策略，投票結果卻證明，北部地區，對政府施政滿意度不佳的民情充分反映在台北市長選舉中，讓民進黨的李應元僅保住 35% 的民進黨基本票源，而國民黨籍的馬英九在在台北所有行政區都獲得勝利，其中包含傳統民進黨票源區的士林、北投、中山、大同、萬華等區都獲得勝利，但在高雄的國民黨籍黃俊英，卻除了有眷村的左營區勝過謝長廷之外，其他地區都敗於謝長廷，論者認為台灣南、北選舉投票的取向，已明顯的劃分出：「北部投表現票，南部投認同票」的傾向，換言之，在北台灣選民可就政府施政良窳的表現，決定票選對象，而南部地區，卻以認同政黨做為選票的投票取向，不論政黨在執政中表現好壞，都會給予最堅定的支持，⁴⁶若以認同層面來看待這個問題，南部學歷低、閩南人多、年紀較大的民眾，對於主張台灣獨立、台灣人出頭天政黨的民進黨支持度，顯然高且堅定不移的特性明顯。這種現象的另一面向，正好顯

⁴⁶ 請參閱：有關胡佛、瞿海源、劉義周等人對談「北高選舉結果的異議與影響」，聯合報，中華民國九十一年十二月八日，版 7、15。；及吳玉山，「北藍表現投票、南綠認同投票」，聯合報，中華民國九十一年十二月九日，版 15，一文的分析討論。

現年輕一輩、高學歷的台灣住民，對於族群認同回流至傳統中國人認同，這種轉變，對於台灣國家認同的牽扯，必然出現另一股決定性的力量。

國內學者吳乃德就以類似的論述與筆者主張吻合，吳乃德認為，族群的界線是可以改變的，不同的族群可以「合併」(amalgamation)成一個新的族群，一個優勢的族群可以將其他族群「吸收」(incorporation)，同一族群可以「分裂」(division)成爲不同於原先族群的全新族群，台灣島內的「外省族群」與「本省族群」各自的族群認同是否消失？或「合併」成一個新的族群？或「統合」？這是朝野政治領袖必須面對的問題，而政治菁英的意識抉擇和行動也在很大程度上影響族群關係的轉變，甚至是有「一個民族之所以誕生，是因爲少數人決定他應該誕生」的現象發生，⁴⁷因此，台灣內部族群認同的轉變可能由傳統認同中華民族，逐漸變成認同「台灣民族」增多，後又因種種因素，使高學歷及年輕一輩的台灣住民回流至傳統「中華民族」，或不排斥「中華民族」認同，當然若執政者有意大力推動，也可能再流回「台灣民族」認同，而這種轉變與政治菁英的政策主張有密切的關係，對於國家認同的轉變，也必然發生一定程度的影響。自李登輝以降的國家領導人主張台灣人認同的政策極爲明顯，因此，現階段台灣族群認同再轉回傳統中華民族認同定於一尊的地步似乎不可能出現，也因此，兩岸關係蛻變成爲兩國關係的支持力道，必然仍是強而有力。

何況，吳乃德研究台灣內部族群認同轉變的過程中，確立了：⁴⁸

族群身份 ——> 族群意識 ——> 政治態度和行爲

的因果關係，若將此因果關係推廣到兩岸關係上，就成了台灣人因爲台灣意識的催化作用，而確認台灣人與中國人是兩個不同的民族，在這種認同確認後，自然表現出特定的政治態度與行爲，而影響及對兩岸關係。

⁴⁷ 吳乃德，「省籍意識、政治支持和國家認同」，頁 36~37。

⁴⁸ 吳乃德，「省籍意識、政治支持和國家認同」，頁 41。

總和二次大戰結束迄今，台灣族群認同轉變的簡單過程，當以兩蔣時代將久經日本教化的「日本人」，經由在國民政府的教化成爲「中國人」，又經李登輝民主化、本土化的影響，讓「中國人」轉化爲「台灣人」，陳水扁的教育（更改正規教育課程內容）、法律（延續李登輝時期的取消祖籍地法律）、及民間（推動鄉土教育）三個方向的努力，深化了「台灣人認同」，但此階段的「台灣人」中，卻發現高學歷及年輕一輩的「台灣人」，有同時容忍中國人與台灣人認同的現象，經由長時間的各類民意調查結果及學理論證發現，這種族群認同的不斷改變確實是個事實，而主政者在面對特殊政治利益考量時，就不得不努力改變台灣族群認同，以符合本身的意識型態與利益，若依據本論文前述提及的雙層賽局模式推論，則主張台灣獨立的陳水扁繼續連任之後，爲其政治目標之實現同時也保有堅強的選民支持力量，那麼就必須不斷的在族群認同上進行與中華民族認同的區隔工作，以便於從中發展出對於台灣獨立於中國之外的整體力量，所以在可見的未來，主政者進一步形塑台灣人認同將是可以預見的。⁴⁹

而這種族群認同的操作與結果，對於兩岸關係的影響也將成爲重要因素。

三、文化認同的轉變趨勢

學者認爲，民族文化不僅是個體也是集體對於其存在狀態認知的重要依據。⁵⁰對國家或族群的建立而言，共同文化的建立具有關鍵性的地位，⁵¹而且諸多證據顯示民族主義是以文化爲核心的，⁵²顯見文化認同的轉變，對於國家認同轉變的重要地位。

⁴⁹ 請參閱第三章及第四章有關「雙層賽局」有關論述。

⁵⁰ Ross Poole, *Nation and Identity*(New York : Routledge, 1999), p. 14.

⁵¹ Smith, *National Identity*, p. 52.

⁵² Smith, *National Identity*, p. 74.

有論者認為，傳統中國文化基本上是以儒家文化為指涉的對象，而眾所周知，台灣與新興工業國家新加坡相同，在工業化後，儒家文化有急速消退的現象，其空缺改以個人利益與民主思想兩大價值體系加以填補，⁵³若然，則台灣在工業化後，文化認同自傳統中國文化中轉變出去，並改變認同已無可逆擋，然而在轉變無可迴避的情況下，其轉變的方向與認同的產生情形，卻是耐人尋味的問題，這個有趣的問題就有許多學者認為，「台灣奇蹟」除了指經濟外也包含文化的轉變，而台灣文化的轉變絕不會是自然發生（just happen），反而是由某特定的「人」所製造（made by somebody, and not equally by everybody）出來的，而「製造文化」的文化政策，又約略分為直接與間接兩種，前者在於文化發展的管理與計畫，後者則藉助於政治、經濟與社會政策的運作，達到主導文化發展的目的，⁵⁴在台灣，政治菁英及其等所設定的文化政策與推動文化認同的作為，就是改變台灣文化認同的關鍵；蔣氏父子、李登輝及陳水扁就是「製造」台灣文化的代表人物，其手段當然包含有直接的以文化建設或其他名目主導文化的轉變，也可利用整個社會的氛圍（如：強調兩岸血濃於水或強調台灣優先）間接的主導文化發展的方向，與人民對文化認同的轉變。

因為民主化、自由化帶來的衝擊，使社會各項禁令解除，也造成文化禁制上的解放，並朝功利主義方向前進，而攸關輿論形塑的媒體，也協助營造了台灣社會的政治緊張關係，進而造就了市民社會的興起，並不再盲目效忠服從過去的事物，在這種自由氣氛中，文化認同就成為台灣自我定位，及思考台灣過去、現在、未來和台灣能夠實現的境界，文化認同更成了探索個人自我定位、族群意識、政治忠誠及生活方向的測試劑（litmus

⁵³ Chun-chieh Huang & Kuang-ming Wu, "Taiwan and the Confucian Aspiration: Toward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in Stevan Harrell & Huang Chun-Chieh, eds., *Cultural Change in Postwar Taiwan*(Colorado: Westview Press, 1994), p. 80.

⁵⁴ Edwin A. Winckler, "Culture Policy on Postwar Taiwan", in Stevan Harrell & Huang Chun-Chieh, eds., *Cultural Change in Postwar Taiwan*, p. 22~23.

test)，文化認同也直接關係著台灣內政與深層的兩岸關係，事實上，文化認同已成為台灣在華人世界、東亞地區、亞太地區甚至全球的定位依據，而去中國化（de-Sinicization）又成為台灣文化認同的一個手段，進一步言，「生命共同體」成為台灣民眾自主的體現。⁵⁵而「生命共同體」在很大程度上，是表達台灣是一個凝聚、獨立、團結、同舟一命，且與大陸徹底分離的「單位」之意。

台灣所面臨國家認同問題，在文化層面的認同轉變是顯而易見的，一九四五年以來，國民黨的制式教育，向來著重於中華文化的灌輸，忽視台灣文化的培養，除南島嶼系的原住民外，台灣數百年來以漢文化為強勢，日據時代強力將日本文化注入台灣漢文化中，尤其是一九三七年後，皇民化運動試圖將台灣強力扭向日本，戰後又強力扭向中國，台灣雖以漢文化為主體，但卻擺盪而無所適從，二二八事件的悲劇，不僅是政治、經濟的衝突，更是文化的衝突，日本既將戰敗之際，台灣文學家吳濁流寫「亞細亞的孤兒」，描繪台灣人民的處境，就是表現這種擺盪於中國與日本之間的無奈。⁵⁶台灣文化的認同轉變，確實有其難以抗拒的壓力存在，同時也表現出灣文化認同隨著統治者轉變而轉變的現實。有論者將數十年間文化的轉變細分其走勢：

（一）、中國化時期

在威權時代，文化認同的形塑是由官方主導，用法令和檢查制度規範民間文化發展。

在台灣光復初期，重點在於清除日本文化，如：掃盡日本語文、取締違禁圖書，日文版的報章雜誌全部撤除，完成官方語文的更替，同時更改了日治時期的州郡街庄，街路地名、學校名稱，改用有中國文化或政治意

⁵⁵ Tu Weiming, "Cultural Identity and the Politics of Recognition in Contemporary Taiwan", in David Shambaugh, ed., *Contemporary Taiwa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1998), pp. 71~74.

⁵⁶ 林瑞明，「台灣文學研究與國家認同」，李鴻禧編，國家認同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台北：財團法人現代學術研究基金會，1993），頁 81~82。

涵的稱呼，為強化中國文化，利用教育文化政策來強調三民主義、民族精神、中國文化教育，並成立國民學校教材編輯委員會：統一編寫國語、歷史、地理等教科書，民國三十五年更設立「臺灣省國語推行委員會」，陸續實施學校、公共場所、傳播媒體等禁止使用本土語言，定於一尊的國語政策，結果雖凝聚了國家意志；卻也造成社會階層差異，壓抑本土文化發展。⁵⁷

為因應民國五〇年代的臺灣，面對歐美文化的衝擊，固有文化陷於危疑飄搖，勢須強化改造，及民國五十五年中共爆發文化大革命，企圖徹底毀滅傳統文化，愈顯中華文化復興的迫切性，重要提振中華文化的措施有：民國五十五年成立國立故宮博物院，五十六年蔣中正宣布以國父孫中山先生誕辰紀念日為中華文化復興節，五十七年成立「中華文化復興運動推行委員會」，將傳統文化與國家建設相結合，使得國語、國學、國畫、國術等均受到相當的重視並達到發揚民族精神的目的。

（二）、本土化初期時期

由於反共文學盛行，導致社會沈悶，極思蛻變，到六〇年代初期，臺灣面臨保釣運動、退出聯合國、日本斷交等外交挫敗，行政院長蔣經國乃推動「革新保臺」政策，重視紮根本土的工作，又在產業轉型所導致的社會急遽變遷中，促使文藝創作者激起回歸、認同本鄉本土的自覺運動，在此過程中，頗能獲得讀者共鳴，也強調文學必須與現實結合，反映本土意識，蘊涵批判意義，衝擊政治文化主流的意識型態，且因而引發「鄉土文學論戰」；在解嚴後，文學作品展現更為多元的面貌，至八〇年代，臺灣文學已取代了鄉土文學的稱呼，而本土藝術亦再受重視。⁵⁸由傳統中國文化認同向台灣本土文化認同轉變的同時，夾雜著對制度認同、族群認同意識型態的轉變，以前述鄉土文學的興起為例，鄉土文學興起所代表的文化

⁵⁷ 請參閱 http://content.edu.tw/senior/history/ks_rs/page/ch19.htm 有關「教育政策的發展」論述。

⁵⁸ 請參閱 http://content.edu.tw/senior/history/ks_rs/page/ch19.htm 有關「戒嚴體制文化的形成」論述。

認同轉變，不僅是反抗國民黨的文化政策，更是深層的反抗中國文化的箝制，故有論者探討自日據時代以來，台灣文學所代表的深層意義時，就認為戰後四十年來，台灣文學裡的民族意識，是一磚一瓦、重新建構起來的，工程比日據時代尤為艱鉅，在文學作品裡，早已拋棄血緣、史緣、地緣，由共同生活的文學凝聚和鍛鍊，形成以文化結合的台灣民族，所以台灣文學始終未脫離台灣民族運動的行列，在建構台灣民族運動中建立，早於台灣民族的建立已建立起台灣民族文學實體。⁵⁹因此，鄉土文學所代表的台灣文化認同，絕不僅是在中國文化認同中尋求台灣文化的活動空間，讓在台灣這個領域中並存著中國文化，及由中國文化為基調所孕育出的台灣文化，讓台灣的文化活動更加豐富而已，鄉土文學興起所代表的台灣文化認同，在某一程度上確實是代表著對於中國文化甚或中國國家認同的否定。⁶⁰此文化認同轉變的軌跡，正代表著文化的獨立於中國之外，而文化的獨立又代表著擁有台灣文化的住民，必須思考屬於他自己的未來。⁶¹

隨著民間對本土文化更加認同，有不少屬於文化抗爭的訴求的社會運動，包括原住民的正名運動、客家人的母語運動、十三行文化遺址與核四預定地文化遺址的搶救運動等，而威權政治的轉型，促使各地方文化呈現多元的發展，營造出特有的地域文化風格，如鶯歌陶瓷、三義木雕、玉井芒果、阿美族的豐年祭等等。其中影響最深遠的，莫過於臺灣史研究與教學日益受重視，並成為關懷鄉土的文化運動，如：民國八十二年中央研究院設立「臺灣史研究所籌備處」，又在八十六學年度起，國中開始教授包括歷史、地理、社會三部分的認識臺灣課程，使得臺灣文化成為社會共同

⁵⁹ 彭瑞金，「台灣民族運動與台灣民族文學」，李鴻禧編，國家認同學術研討會論文集，頁 75～76。

⁶⁰ 請參閱：江政寬，「台灣歷史中的反抗精神」，夏朝基金會編，中國意識與台灣意識，頁 313～316 相關論述，及該文所引盧建榮、陳正靛等人的觀點，都有與筆者相同的看法。

⁶¹ Alan M. Wachman, *Taiwan - National Identity and Democratization* (New York: An East Gate Book, 1994), p. 104.

資產，隨後本土語言的使用不再受限，大眾傳播媒體與流行通俗演藝中的臺灣文化題材，日益增加等等。

其實，本土文化的興起，早在蔣經國時代起就逐步成形，如：一九八一年十一月十一日年成立的「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將文化建設涵括在十二大建設之中、於各縣市成立文化中心，設置文物館，舉辦文藝季，推動「社區總體營造」計畫，發展地方文化特色，又爲了加強保存文化資產於民國七十一年公布《文化資產保護法》，對民間傳統技藝進行調查研究，以增進瞭解及維護發揚，籌設保存傳統文化專責機構，自民國七十四年起舉辦民族藝術薪傳獎，指定各類國家級以至地方政府級的古蹟，將本土文化納入國家文化的體系，設立文獻會等機構，從事史料搜集整理、資料翻譯工作，及增進族群文化融合的工作。⁶²

（三）、「去中國化」時期

在蔣經國主政時期成立「文建會」，目的在於讓台灣「去日本化」轉向「中國化」更爲「反共」政策服務，具體作爲包括：壓抑左翼文化與作家，大量資助反共作家、提倡反共文學、話劇創作等反共文藝，並以資源分配策略，降低台語文學、布袋戲、歌仔戲等本土傳統藝術的計畫與預算，藉以邊緣化、低俗化台灣文化認同，但同時大量扶植與「中國」相關的文學、戲劇與展演等。結果是成功的建構了「中國」認同，但卻造成台灣社會長期對於台灣文化歷史的不瞭解與扭曲，引發台灣認同的危機。

八〇年代末期，隨著草根社會力量的全面釋放，以及政治改革的要求，至李登輝開始走向本土化與台灣化。一九九四年九月，時任文建會副主委的陳其南，提出了「社區總體營造」政策，讓文建會實施長達十多年的復興中華文化政策，從此轉型爲強調台灣在地社區與集體參與的本土化政策。⁶³而本土文化政策或鄉土文學的提倡，可促使人們透過這些文化形

⁶² 請參閱 http://content.edu.tw/senior/history/ks_rs/page/ch19.htm 有關「政府的文化建設」論述。

⁶³ 請參閱：「『文化認同』中看過去、現在與未來---文建會將過 20 歲生日」，張貼於：

塑他們是何人？住在哪裡？傳統為何？認同的分享等等的意識。⁶⁴因此，文化認同與國家認同有密不可分的連結關係。

也因此，台灣文化認同的轉變就有國內學者高柏園直指與政治因素有密不可分的關係，依據高柏園的說法是，這種轉變約可分為兩個階段：

1、一八九五年因甲午戰敗割讓台灣，台灣當時曾宣佈獨立並抗日，此次獨立基本上是因政治因素壓迫使然，在主觀上並未自外於中國，尤其在文化上更未見分離，日本人對台灣的中國文化內容之排斥，反而更激起台灣人民對中國文化的認同與珍惜。

2、一九四五年二戰結束，台灣回歸中國，一九四九年國民黨政府遷台，到七〇年代台灣鄉土文學的開創充分展現了台灣意識，而鄉土文學基本上是一種文化自覺，也就是試圖在僵化的文化環境中，凸顯台灣本地的特色與主體性，這個鄉土文學運動，顯然與政治環境有密切的關係。

雖然高柏園認為這種文化認同的轉折，與其說是對中國文化的批判，不如說是對國民政府文化政策的批判，也不認為台灣意識與中國文化有任何嚴重的衝突可言。⁶⁵但是依據台灣對於文化認同的轉折，尤其是在一九四九年後兩岸的對峙狀態下，單就文化認同的層次上看，當大陸在批孔揚秦、打倒孔家店時，台灣以復興中華文化作為口號，取得對中國文化之解釋權與主導權，但在台灣本土文化興起後，台灣對於中國文化的解釋權與主導權已然動搖，⁶⁶真實的情況可能是，台灣文化與中國文化的差別已然難以估算，台灣文化中國文已經呈現完全不同面貌，台灣當然因而喪失對於中華文化的主導權，兩者的差別，也造成兩岸文化認同的差別，台灣意

<http://www.libertytimes.com.tw/2001/new/nov/5/life/art-1.htm> 網站。

⁶⁴ Poole, *Nation and Identity*, p. 26.

⁶⁵ 高柏園，「台灣意識與文化中國的文化定位」，夏潮基金會編，中國意識與台灣意識，頁 236～239。

⁶⁶ 高柏園，「台灣意識與文化中國的文化定位」，頁 228。

識與中國文化顯然是經由分歧而減低相關，當然就無高柏園所言的兩者無衝突現象，而是兩者以各自成爲兩個有相關卻日漸不同的文化體系了。

何以致此？有外國學者認爲台灣文化自一九八〇年之後，又延續過去台灣在清廷時代就有的國際主意色彩，繼續大量吸收中國以外的文化，同時認爲，未來主導台灣文化是市場的需求，不是國家或是廣播網路，並受全球自由化與統合化的趨勢所左右，⁶⁷若依此論調看待別的國家或文化體系，那麼全球文化就有日漸趨同而無法分別的現象發生，但是，事實上卻是，在可見的未來，各文化體系的特色仍不會因此消失無蹤，台灣文化、大陸文化、日本文化、美國文化或其他各地區的文化表現仍將各具特色，Samuel P. Huntington 甚至認爲冷戰結束後，不同文化將取代意識型態、政治或經濟因素的不同，⁶⁸成爲新世紀國際衝突的根源，突顯在可見未來，各自堅持自我文化特色的趨勢；台灣文化的轉變在經歷數十年與大陸區隔及人爲創造後，原本就與大陸文化有所區別，那麼，台灣有意放棄解釋與主導早已不同的大陸文化，不僅是難以避免的結果，進一步言，更是台灣主政者有意或無意的主動所造成，如此變遷，對於文化認同的轉變，自然一目了然。

（四）、台灣文化認同的深化

依據宏觀面審視跟隨文化認同轉變的制度認同與族群認同轉變，不得不認爲，在文化認同層面上，台灣喪失對中國文化主導權與解釋權的趨勢，雖是客觀因素造成兩者相當程度的區隔而無能力掌握外，在主觀上更是台灣主動的放棄掌握，如：兩蔣時代爲因應大陸文化大革命的人爲改變文化認同局勢，卻堅持傳統中華文化的維持，使得兩岸在文化的創造、維護及認同上經歷了歷史上的重要轉折點，弔詭的成爲台灣的堅持中華文化與大陸文化大革命的極力毀棄傳統中華文化，竟然加強了兩岸文化的差異

⁶⁷ Winckler, "Culture Policy on Postwar Taiwan", p. 35.

⁶⁸ Samuel P. Huntington, *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and the Remaking of World Order*(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2003), p. 21.

性，到李登輝、陳水扁時代強調台灣文化的主體性，基本上，都是站在與中國大陸文化分道揚鑣各自發展的立場面對兩岸文化的認同，這使得在兩蔣時代，因堅持傳統中華文化，而造成與文化大革命後的中國文化有所差距的台灣文化更加分歧，這種趨勢，充分凸顯了文化認同轉變的深化。

副總統呂秀蓮在二〇〇〇年就職前接受中國時報採訪時，也表明了這樣一種區隔的心態，在被問到如何理解她所提出的海洋立國之說時，她言道：「民進黨是在台灣誕生的，而國民黨是在大陸誕生的，基本思維完全不同，國民黨始終以中原文化來看待邊陲的台灣」，在這裡呂秀蓮是要用所謂的海洋文化區隔中原文化；⁶⁹陳水扁執政三年後，宣示其文化政策也指出，不是單將文化的層面，關注在一般層面的表演、展覽或活動的參與，而是看重台灣文化深耕厚植的整體面向，是希望讓文化與民眾的生活能充分融合與參與，進而產生大家對文化認同的原動力；整個台灣文化的發展，就在強調「多元」、「尊重」、「本土」、「國際」、「永續」五大原則下，希望全國各縣市、社區，都能發掘出具有地區鄉土特色的文化產業或文化活動，以台灣精神為根本、以台灣文化菁華為養分的文化復興、文化再造、再生的工程，一步步讓我們走向以「文化立國」邁向國際的新台灣文化願景。⁷⁰

陳水扁與呂秀蓮的談話充分表現了當前執政者對於中國文化的態度，更凸顯台灣文化認同的被強調，及與大陸文化進行區隔的重要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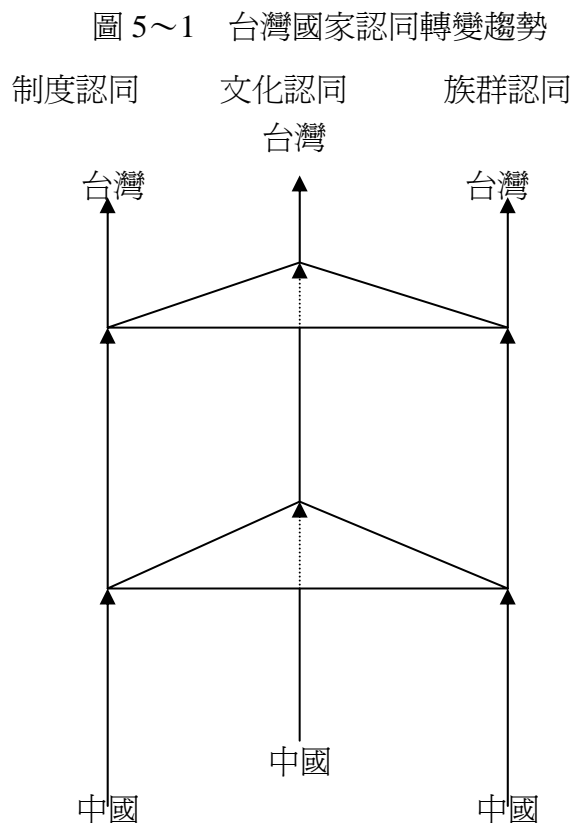
民進黨自二〇〇〇年起主政，又在二〇〇四年連任成功，這種與中國文化進行區隔的工作必然會持續被強調，這就是往後台灣文化認同的大趨勢。

⁶⁹楊劍，「台灣站起來——揖別『中國』？」，張貼於：[投資中國](http://www.chinabiz.org.tw/maz/InvCina/200007-077/200007-008.html)
<http://www.chinabiz.org.tw/maz/InvCina/200007-077/200007-008.html> 網站。

⁷⁰「看見進步台灣——統施政的回顧與願景：建設一個以台灣為主體的『文化大國』」，張貼於總統府 http://www.president.gov.tw/1_president/achieve/subject17.html 網站。

由制度認同、文化認同及族群認同等三個面向上觀察，台灣都向脫離中國方向前進。

本文在國家認同架構中，以制度認同、族群認同及文化認同作為國家認同的三個環節，若以圖形表示，或許可將此三個環節比做國家認同建構的三個點，而三點可成一面，這個面就是「國家認同」，經由前述的討論，清楚地發現，制度、文化及族群認同在台灣的演進，都朝向與大陸分離的方向前進，由前進後的點所建構的國家認同面，應該是不斷的朝台灣獨立的方向接近，就如下圖所示：



依據此圖形的推論，在現有資料顯示的狀況下，或許制度認同「點」，自兩蔣時代就與大陸進行你死我活的分離，至今只見深化未見合流，而族群認同「點」與文化認同「點」雖然也朝台灣方向前進，但強度顯然沒有制度認同「點」強，族群認同的「點」近幾年甚至還有稍許回流的現象，所以現階段由此三點所形成的國家認同，或許只能以傾斜的、而

不是水平的「面」來呈現，但可確認的是，這三個點所構成的國家認同「面」，不論傾斜程度如何，與大陸逐漸分離卻是事實，若往後族群認同及文化認同更加深入轉向台灣，以致「追上」制度認同面，那麼「一邊一國」的現象與事實將更加牢不可破，而「一邊一國」的國家認同若逐漸牢不可破，就代表著台灣主流民意在國家認同層面上更趨近於獨立一方。

在兩蔣時代，因為在高壓統治下，民意幾乎完全由統治者掌握，民眾對於傳統中國的國家認同幾乎沒有不同意見的生存空間，因此，兩蔣時代，可依據他們創造的民意為依據，面對中國大陸展開那一時期的兩岸關係，但在李登輝時代起，因上自總統下至各級公職都由人民直選，民意可經由選票直接反應，政治菁英面對這種趨勢，該如何掌握主流民意，獲取最大多數的選票以實現執政理想，就成為當前政治菁英最嚴肅的課題之一。

第二節 政黨競爭中的國家認同因素

西方學者在研究中國的國家認同中驚奇發現，在中國具有差異極大的五十六個族（包含佔最大多數的漢民族及其他五十五個少數民族）竟能大致整合成一個民族國家，主要是依據共同的儒家文化作為統合的基礎，James Watson 在一九九三年發表的著作，更認為在廣大的中國，因民族的融合並由此融合所達成的國家認同，主要是透過兩個因素所造成：一、以對抗帝國主義為共同的目標，二、共同接受儒家文化為行為的標準，⁷¹若依此推論當前台灣的國家認同問題，可以輕易的發現，台灣與大陸在一九四九年的兩蔣時代，因內戰造成兩岸分裂成兩個主權國家起，在兵戎相向中，早已經喪失對抗共同敵人的共同目標，在國家認同上已不自覺的建立

⁷¹ Martha L.Cottam & Richard W.Cottam, *Nationalism & Politics* (Colorado: Lynne Rienner, 2001), pp. 83~84.

起分道揚鑣的基礎，而經過李登輝、陳水扁主政下強調台灣化、本土化，有意的讓台灣文化與中華文化，台灣民族與中華民族做出區隔的政策推動下，兩岸在國家認同與整合上，幾乎已經徹底斷裂。在台灣主流民意轉變為自認與大陸不同的民族、不同的制度與不同的文化趨勢下，若以西方一個民族建立一個國家的觀點看待兩岸當前的態勢，台灣面對大陸幾乎等同於世界上存在時間長而數量多的大小民族對峙問題，而台灣就是以少數民族的姿態與大陸對峙，而少數民族為保留自己文化及權力最佳的作法與意願，就是與「母體」分離而獨立成為一個國家。⁷²

在台灣的發展過程中，時至今日台灣化（Taiwanization）、本土化或是去中國化，已經不再是民進黨的專利，各黨各派領導人也競相提倡，這又進一步改變台灣的制度結構與文化，並自然造成與中國大陸的衝突。⁷³尤其是在六〇及七〇年代，以因應工業化後的經濟情勢，必須「同化」各族為主流思想的少數民族政策，逐漸被回復少數民族民族主義並建立民族國家的思潮所取代，少數民族主義及獨立建國的思潮更是風起雲湧，⁷⁴台灣在這股世界潮流中，配合內部國家認同的轉變，追求獨立或至少與大陸這個「母體」保持一定的距離，幾乎已成無可避免的選擇。

若由一九四五年國民政府接收台灣起算，台灣國家認同的轉變，約略可分由海外台獨勢力的鼓吹，與台灣內部因政治情勢轉變所引起的國家認同轉變，但兩者最終卻合流，或可有如下的軌跡可循：⁷⁵

（一）、一九四五年十月二十五日，台灣人民熱烈歡迎祖國。

（二）、一九四七年二二八事件爆發，隨後廖文毅在日本，以老一輩受過日本教育的台灣人為主，組成「台灣國臨時政府」掀起海外台獨運動，

⁷² Michael Watson, *Contemporary Minority Nationalism*(New York: Routledge, 1990), p. 171.

⁷³ Weiming, "Cultural Identity and the Politics of Recognition in Contemporary Taiwan", p. 78.

⁷⁴ Watson, *Contemporary Minority Nationalism*, p. 195.

⁷⁵ 張炎憲，「台灣史上的政治運動與國家認同」，李鴻禧編，國家認同學術研討會論文集，頁108~111。

待台灣留學日本學生漸多以後，王育德等人另組台灣青年社，其勢力擴及美國，形成今日的台灣建國聯盟。（一九七〇年之前，台獨論者相當強調台灣人與中國人的區別與對立性，七〇年代之後，由於國內政治結構的變動，開始轉變成只要認同台灣就是台灣人，但以台灣獨立做為國家認同的目標，卻一直沒有改變。）

（三）、一九四九年，國民政府來台，以黨、政、軍、特力量，積極整頓、掌控台灣，利用文化教育管道改造台灣人成為中國人，壓制防範台灣意識或獨立意識的成長。

（四）、一九五〇、六〇年代，台灣省議會藉由郭雨新、郭國基、李萬居、許世賢、李源棧、吳三連等黨外人士維繫台灣人反抗意識，一九六〇年，雷震試圖結合外省人與本省人組成政黨，卻以失敗收場。一九六四年，彭明敏、謝聰敏、魏廷朝等發表「台灣人自救運動宣言」，指國民黨宣稱代表中國是虛幻的，表示台灣唯有建立一個新而獨立的國家才能自救。這份宣言在台灣內部被鎮壓，在海外卻獲共鳴，使許多留學生加入台獨陣營。

（五）、一九七〇年以前，台灣政治運動是隱藏的，七〇年後逐漸浮現。七一年中華民國退出聯合國，迫使台灣人重新思考台灣的定位。七五年的台灣政論、七七年、七八年的台灣鄉土文學論戰，七七年中壢事件，七九年美麗島雜誌發行，最後爆發美麗島事件。

（六）、美麗島事件後隔年起，經由雜誌八〇年代、博觀、深耕、鐘鼓鑼、關懷、前進、開創、新潮流、政治家、自由時代等等，將台灣意識不斷提升，終於展開了中國結與台灣結的辯證，伏下日後統獨的論爭。

（七）、一九八七年，二二八和平促進會要求平反二二八，象徵台灣人心靈的重建，以及當家作主的信心。八九年鄭南榕自焚，突破公開談論台獨的禁忌；八九年立委選舉，有些民進黨候選人提出建立台灣為新國家的主張，標示台灣已經進入另一個運動和國家認同的階段。

(八)、一九九一年，國民黨廢除動員戡亂，承認中共為政治實體；發生獨台會事件、保護十三行文化運動、一〇〇行動聯盟廢除刑法一百條行動、民進黨通過台獨黨綱、台獨聯盟遷盟回台、國民黨轉變成獨台路線、一中一台與一個中國政策的爭論、地方政府實施鄉土教材、外省人獨立促進會成立等，這些都在追求台灣地位的重新確立及台灣新文化內涵。

(九)、李登輝接任蔣經國為中華民國總統，持續推動台灣國家認同的轉變，相繼有：台灣人的悲哀、外來政權、新台灣人、修憲、凍省、兩國論等等言論的提出。最後由主張台獨的陳水扁繼任總統，深化國家認同到達最明確的「一邊一國」程度，李登輝卸任後也給予公開支持，甚至明確的要求台灣獨立。

由這一系列的轉變趨勢，顯然台灣國家認同的轉變起於反對運動者，且是由追求民主化入手，如：五〇、六〇年代郭雨新、雷震等人的奮鬥，經過美麗島事件後，逐漸轉為激進要求台灣獨立，最後連執政的國民黨也加入國家認同轉變競爭行列，深怕在此競爭中，因失敗而失去政權。

自兩蔣時代迄今，國家認同的起伏上，反對運動者所呈現的是由反國民黨及國民黨所代表的「一個中國」國家認同，逐漸轉變為反對中華人民共和國所代表的「一個中國」，質上的轉變明顯易見。贊成統一的陣營，也由分別為「統一在社會主義（或共產主義）下的中國」，如：台灣內部少數及統派人士的主張，與「統一在非社會主義（或共產主義）下的中國」，如：國民黨在兩蔣時代以反攻大陸為主的主張，逐漸合流成為「單純的中國統一，統一的形式容許協商」的狀況，因此，統獨兩陣營就成了單純的統一或獨立的尖銳對立。事實上，這種轉變與一九四九年到一九九〇年，蘇聯、東歐、波蘭的共產主義政權相繼倒台，及一九八九年中共發生天安門民運，世局進入後冷戰時期，標誌著共產主義的勢力急速由強轉弱的情勢，有強烈的關係，以台灣的立場看待這個問題，是主政的國民黨在共產主義轉弱之前，可以用「反共抗俄」或相關的意識型態提倡來對抗共產黨，

這種訴求配合兩蔣時代的高壓政策，不僅有效的壓制台灣的民主化，並在當時被大部分民眾所接受，但在八〇年代兩岸交往大幅增加的基礎上，及在九〇年代冷戰結束後，台灣民主化的訴求相對高漲，而共產政權的相繼瓦解或對外開放，主政的國民黨政府再也無力以「反共」、「恐共」、「懼共」的方式壓制民主化，或純化台灣內部一個中國的國家認同，台灣民主化的必然結果，就是在國家認同問題上進行更大規模的轉變。

與國家認同有密切關係的國家整合，有學者認為，大略而言，有一強大的一黨優勢制度，較適合於開發中國家；兩黨制則較適合於民主先進國家；多黨制，則適用於無一優勢團體存在，且文化多元程度較高的民主國家的整合。⁷⁶檢視台灣由兩蔣時代的一黨專政、一黨獨大，從國家整合的角度看，確實有利於將台灣由日本統治下所形塑的國家認同，把台灣人民經由「再社會化」(re-socialization)成爲中國人，把日本文化清除殆盡，讓台灣人民認同中華文化，更強行將中華民國政治制度運行於台灣，終將台灣納入成爲中國的一部份，成功的在台灣塑造出傳統的一個中國國家認同，這個過程在一黨獨大下，確有極大的方便性；隨著時序的演進，在李登輝時代兩黨制或多黨制成爲台灣發展的趨勢，也因此演變出國家整合與國家認同的多元意見，也不得不成爲必然的發展結果，在國民黨一黨獨大的年代理，前期明顯的是以政黨本身從事國家整合，但在民進黨出現後，開始逐漸採取包容政策，對社會運動採取較寬容的政策，將以政黨從事整合的政策，轉爲以政府從事整合的基地，政府逐漸成爲各種國家整合、國家前途主張勢力的「仲裁者」，⁷⁷讓台灣各族群、各種國家前途主張的堅持者，在國家現有體制內進行辯論、融合，讓國家的整合得以遂行，最終使得某一種的國家認同經由民意的嚴酷考驗，而成爲民意的主流。

⁷⁶ 葛永光，文化多元主義與國家整合-兼論中國認同的形成與挑戰（台北：正中，1993），頁 156。

⁷⁷ 葛永光，文化多元主義與國家整合-兼論中國認同的形成與挑戰，頁 175。

有學者認為，近年來台灣所面對的認同課題，對內在於如何定義公民身份的資格，並嘗試協調和解多元族群的認同觀，對外則在於如何於國際社會孤立中取得尊嚴，尋求與中國民族意識作有效的區隔。因此，對於政治菁英來說，國家認同的訴求不只是關心選票的取得，更是要為台灣的未來作定位，譬如說推動台灣獨立運動者所揭櫫的「台灣民族主義」，或是李登輝近年來揮舞的「新台灣人主義」就是為這種目的而存在的。⁷⁸

檢視台灣政治發展的過程，可發現在一九八八年、八九年首先形成民進黨與國民黨的對抗，繼之八九年後擴大為國民黨內部主流與非主流的對抗，到了九三年又演變成新黨成立加入對抗的局面，過去台灣的三個主要政黨，雖不完全是，但可以說都離不開國家認同問題，⁷⁹在兩千年總統直選後，又有了親民黨與台灣團結聯盟的出現，雖增加政黨之間錯綜複雜的關係，但仍然難以脫離在國家認同議題中各政黨相互混戰的局面。國內學者吳乃德曾有研究指出，台灣政黨支持的幾個重要的社會基礎，分別為：「國家認同」、「民主理念」和「族群意識」，國民黨與民進黨的支持群眾在此三個主觀態度上有明顯的差異，其中民主理念隨著民主的演化與進步，將逐漸喪失其分歧，剩下國家認同與族群意識，可以作為選舉動員最重要的基礎。⁸⁰若以江宜樺的觀點，則認為國家認同包含有「族群認同」、「制度認同」及「族群認同」三個環節，與吳乃德的論述看似有所差異，但詳細檢視卻會發現，吳乃德僅是將「族群意識」獨立於「國家認同」之外，但吳乃德的「國家認同」及「民主理念」卻與江宜樺的「制度認同」相通，因此，兩者的論點本質並無不同，僅是論述的重點甚或僅是使用的名詞相異而已，為了論述方便，此處以江宜樺

⁷⁸ 施正鋒，「台灣人的國家認同」，張貼於：台灣獨立建國聯盟 www.wufi.org.tw 網站上的「獨立建國論壇」中。

⁷⁹ 張茂桂，「談『身份認同政治』的幾個問題」，游盈隆主編，民主鞏固或崩潰：台灣二十一世紀的挑戰（台北：月旦，1998），頁 91。

⁸⁰ 吳乃德，「自由主義和族群認同：搜尋台灣民族主義的意識型態」，徐火炎等著，台灣族群政治專題（台灣政治學刊創刊號），頁 8。

的論點為基礎，準此而論，民進黨的支持者必然在「族群認同」(或稱「族群意識」、及「制度認同」(或稱「國家認同」)，及因此而來的「文化認同」上，較支持台灣應該獨立於傳統中國之外，而國民黨的支持者應該比較支持台灣與大陸在追求未來的統一的國家認同，在政黨分合中，或可進一步言，泛藍軍的支持者應該比較支持台灣與大陸未來將統一的國家認同，泛綠軍則比較支持台灣必將獨立的國家認同，換言之，由藍、綠兩個陣營的得票率變化，也可看出台灣內部對於國家認同的變遷情形。

再借用前一章有關藍、綠軍得票率變化情形加以分析，⁸¹可從這些對統獨意識型態明顯的主要政黨的得票率變化，發現雖然台灣地區民眾的國家認同傾向不斷向台灣獨立方向傾斜，但與傳統中國認同仍處於拉鋸階段，單一的國家認同顯然尚未完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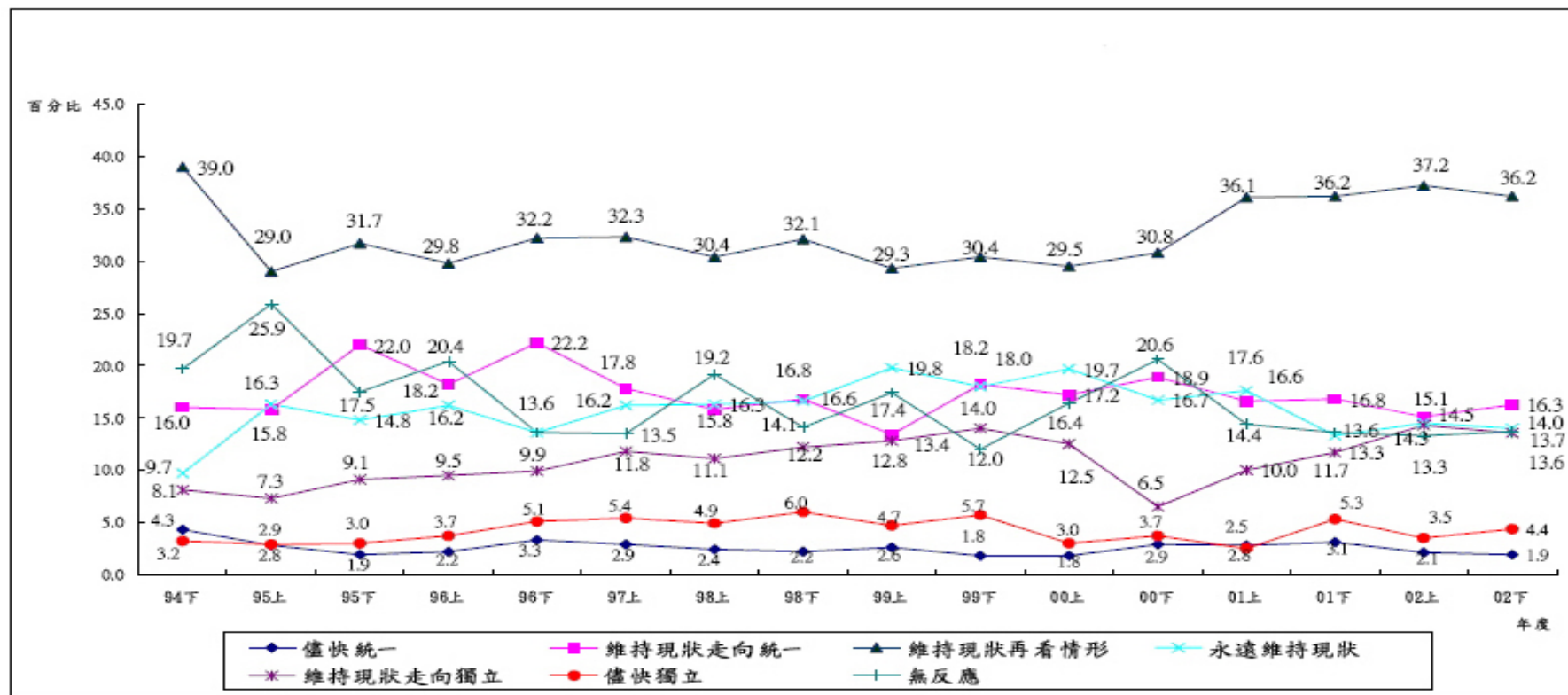
一九九四年到二〇〇二年的統獨民意走向，依據陳義彥與陳陸輝根據政治大學選研中心歷年電話訪問結果，整理成的曲線圖大略如下：⁸²

⁸¹ 即前一章有關 1995、1998、2001 三年間，泛藍與泛綠陣營立委得票率的變化，可發現，主張獨立的政黨：民進黨、建國黨及台聯黨，在建國黨與台聯黨未加入選局前的 1995 年，民進黨得票率為 33.17%，1998 年建國黨加入選局後，民進黨得票率雖然下降為 29.56%，但建國黨獲得 1.45%，兩者相加亦達 31.01%，仍然維持台獨力量支持水平，在 2001 年又加入台聯黨，民進黨得票率達 33.38，台聯黨獲 7.76%，建國黨獲 0.01%，三者相加，獲得票率達 41.14%，而主張統一或保持現狀再統一的國民黨、親民黨及新黨，得票率依據前述的推論，可獲得如下的結果：1995 年國民黨 46.2%加新黨 12.95%共計 59.15%，1998 年國民黨 46.43%加新黨 7.06%共計獲得 53.49%，到 2001 年國民黨 28.79%加新黨 2.61%加親民黨 18.57%三黨共獲得 49.97%選票，由獨派政黨在李登輝執政後期其至陳水扁執政的前期，獲得選票支持的百分比由 33.17%到 31.01%再到 41.14%，而中間偏統政黨得票率卻由 59.15%到 53.49%再到 49.97%一路下滑，顯見台灣民眾對於國家認同的轉變亦有不斷向台灣獨立方向前進的趨勢。

⁸² 陳義彥、陳陸輝著，「模稜兩可的態度還是不確定的未來：台灣民眾統獨的解析」，頁 11～12；該論文於 2002 年 12 月 20 日，在台大社會科學院國際會議廳所舉辦「兩岸關係：變遷、定位與策略」研討會中發表。據前述「民眾的統獨態度趨勢分佈圖」作者所做的解釋，認為一九九四年到二〇〇二年台灣民眾的統獨態勢趨勢，「維持現狀看情況再做決定」的這個選項一直獲得較多民眾的支持，在一九九四年到二〇〇〇年之間，都相當平穩的維持在三成左右，但在二〇〇一年以後上升到三成六上下，顯示在政黨輪替後，兩岸關係始終沒有突破性的發展，所以民眾持觀望態度的比例又上升。此外，較值得注意的是支持「維持現狀走向獨立」的

比例，從一九九六年以前的不到 10.0%的比例，在一九九七上半年上升到 11.8%，更在一九九九下半年上升到 14.0%，顯示支持此一主張的比例有向上攀升的趨勢。不過，在二〇〇〇年下半年，民進黨政府陸續發生「八掌溪事件」以及「核四停建案」，民進黨政府聲勢低迷而朝野對抗轉趨白熱化的同時，支持「維持現狀走向獨立」的比例也迅速下跌。不過，在二〇〇一年立委選舉過後，民進黨政府贏得國會相對多數之後，支持的比例又逐漸回升。

圖 5~2 1994 至 2002 年台灣統獨民意走向圖



資料來源：陳義彥、陳陸輝，「模稜兩可的態度還是不確定的未來：台灣民眾統獨的解析」，頁 10；該論文於 2002 年 12 月 20 日，在台大社會科學院國際會議廳所舉辦「兩岸關係：變遷、定位與策略」研討會中發表。

依據這個統獨民意走向圖，發現維持現狀觀望再決定的民調支持度不僅保持相當的穩定多數，而且有略微向上揚升的趨勢，而維持現狀再走向統一的有下降的趨勢，維持現狀走向獨立則有上揚的趨勢。

以另一個角度分析：

表5~3 台灣地區民眾統獨傾向分佈表，1994-2002年

	傾向獨立	維持現狀	傾向統一	無反應
1994上半年	11.3	48.7	20.3	19.7
1995上半年	10.2	45.3	18.6	25.9
1995下半年	12.1	46.5	23.9	17.5
1996上半年	13.2	46.0	20.4	20.4
1996下半年	15.0	45.8	25.5	13.6
1997上半年	17.2	48.5	20.7	13.5
1998 上半年	16.0	46.7	18.2	19.2
1998下半年	18.2	48.7	19.0	14.1
1999上半年	17.5	49.1	16.0	17.4
1999下半年	19.7	48.4	20.0	12.0
2000上半年	15.5	49.2	19.0	16.4
2000下半年	10.2	47.5	21.8	20.6
2001上半年	12.5	53.7	19.4	14.4
2001下半年	17.0	49.5	19.9	13.6
2002上半年	17.8	51.7	17.2	13.3
2002下半年	18.0	50.2	18.2	13.7
歷年平均	15.1	48.5	19.9	16.6
最大值	19.7	53.7	25.5	25.9
最小值	10.2	45.3	16.0	12.0
全距	9.5	8.4	9.5	13.9

資料來源：陳義彥、陳陸輝，「模稜兩可的態度還是不確定的未來：台灣民眾統獨的解析」，頁11。

說明：本表將「儘快獨立」與「維持現狀走向獨立」合併為「傾向獨立」，「永遠維持現狀」與「維持現狀，看情形再決定」合併為「維持現狀」以及「儘快統一」與「維持現狀走向統一」合併為「傾向統一」。

依據表5~3分析可以發現，傾向獨立的比例，在一九九九年「兩國論」提出前後的比例為最高，接近兩成的比例，至於「傾向統一」的分佈，則是在一九九六年下半年到達了超過四分之一的民眾支持的最高比例，其後有一路下降的趨勢。⁸³

若進一步以不同世代的台灣民眾，對於統獨偏好加以研究如下表：

⁸³ 陳義彥、陳陸輝，「模稜兩可的態度還是不確定的未來：台灣民眾統獨的解析」，頁11。

表 5~4 不同政治世代的台灣民眾的統獨觀, 1995-2001 年

世代 (出生年)	統獨偏好	1995	1998	2001	平均	差異
第一代： 1942 年以及之前	傾向統一	21.5	23.9	21.4	22.3	-0.1
	維持現狀	29.5	34.10	29.7	31.1	0.2
	傾向獨立	11.3	14.8	20.1	15.4	8.8
	無反應	37.7	27.3	28.8	31.3	-8.9
(樣本數)		(363)	(264)	(364)		
第二代： 1943 至 1960 年	傾向統一	19.7	22.4	18.1	20.1	-1.6
	維持現狀	52.6	49.6	56.3	52.8	3.7
	傾向獨立	15.2	21.4	16.8	17.8	1.6
	無反應	12.5	6.5	8.9	9.3	-3.6
(樣本數)		(538)	(401)	(620)		
第三代： 1961 年以及 之後	傾向統一	29.6	25.3	27.6	27.5	-2.0
	維持現狀	53.7	50.5	53.5	52.6	-0.2
	傾向獨立	12.3	20.5	13.8	15.5	1.5
	無反應	4.4	3.7	5.1	4.4	0.7
(樣本數)		(585)	(541)	(1,036)		
所有樣本	傾向統一	24.0	24.0	23.6	23.9	-0.4
	維持現狀	47.4	46.6	50.0	48.0	2.6
	傾向獨立	13.1	19.6	15.8	16.2	2.8
	無反應	15.5	9.8	10.5	11.9	-5.0
(樣本數)		(1,486)	(1,206)	(2,020)		

資料來源：政治大學選舉研究中心，立委選舉後面訪資料。轉注自：陳義彥、陳陸輝，「模稜兩可的態度還是不確定的未來：台灣民眾統獨的解析」，頁 14。作者切割世代的依據是，一九四三年以前大多受過國民黨的小學教育，一九六〇年出生者在成長過程中，正好經歷選罷法通過及黨外運動挑戰國民黨時代，心態上更為開放；夾在中間的第二代，則目睹我國退出聯合國等外交挫敗，及風起雲湧的黨外活動。

由不同世代的分析可以發現傾向支持獨立的民眾，老一輩（第一代）在李登輝執政時期的一九九五年起逐步上升，另兩個年輕世代也是在李登輝執政的一九九五年起不斷的上升，直到二〇〇一年才緩步下降，這種下降是否因為整個台灣地區經濟情況變差，以及大陸地區潛在的就業機會以及經濟誘因所吸引，需要進一步探究。⁸⁴

若以本省民眾與外省民眾的統獨傾向分析，結果又如下兩個表：

表 5~5 不同政治世代的本省閩南民眾的統獨觀, 1995-2001 年

世代 (出生年)	統獨偏好	1995	1998	2001	平均	差異
----------	------	------	------	------	----	----

⁸⁴ 陳義彥、陳陸輝，「模稜兩可的態度還是不確定的未來：台灣民眾統獨的解析」，頁 13。

第一代： 1942 年 以及之前	傾向統一	10.9	14.3	13.0	12.7	2.1
	維持現狀	34.9	35.4	30.8	33.7	-4.1
	傾向獨立	14.8	18.9	24.1	19.3	9.3
	無反應	39.3	31.4	32.0	34.2	-7.3
(樣本數)		(229)	(175)	(253)		
第二代： 1943 至 1960 年	傾向統一	18.4	18.1	16.9	17.8	-1.5
	維持現狀	52.1	49.5	54.5	52.0	2.4
	傾向獨立	15.9	24.9	19.0	19.9	3.1
	無反應	13.6	7.5*	9.6	11.6	-4.0
(樣本數)		(403)	(293)	(490)		
第三代： 1961 年以 及 之後	傾向統一	25.9	23.5	24.5	24.6	-1.4
	維持現狀	54.5	51.6	54.3	53.5	-0.2
	傾向獨立	14.3	22.5	16.6	17.8	2.3
	無反應	5.3*	2.4*	4.6	4.1	-0.7
(樣本數)		(398)	(409)	(781)		
所有樣本	傾向統一	19.6	19.8	20.1	19.8	0.5
	維持現狀	49.2	47.7	50.5	49.1	1.3
	傾向獨立	15.0	22.6	18.6	18.7	3.6
	無反應	16.1	9.9	10.8	12.3	-5.3
(樣本數)		(1,030)	(877)	(1,524)		

說明：*表示該細格樣本數少於 25。

資料來源：政治大學選舉研究中心，立委選舉後面訪資料。轉注自：陳義彥、陳陸輝，「模稜兩可的態度還是不確定的未來：台灣民眾統獨的解析」，頁 15。

表 5~6 不同政治世代的大陸各省民眾的統獨觀，1995-2001 年

世代（出生年）	統獨偏好	1995	1998	2001	平均	差異
第一代： 1942 年 以及之前	傾向統一	60.3	65.1	69.8	65.1	9.5
	維持現狀	22.1*	25.6*	17.0*	21.6	-5.1
	傾向獨立	2.9*	4.7*	5.7*	4.4	2.8
	無反應	14.7*	4.7*	7.5*	9.0	-7.2
(樣本數)		(68)	(43)	(53)		
第二代： 1943 至 1960 年	傾向統一	30.2*	39.0*	51.5*	40.2	21.3
	維持現狀	52.8	39.0*	39.4*	43.7	-13.4
	傾向獨立	13.2*	17.1*	3.0*	11.1	-10.2
	無反應	3.8*	4.9*	6.1*	4.9	2.3
(樣本數)		(53)	(41)	(33)		
第三代： 1961 年以 及	傾向統一	46.0	44.4	38.3	42.9	-7.7
	維持現狀	44.8	41.3	51.3	45.8	6.5
	傾向獨立	8.0*	9.5*	3.5*	7.0	-4.5

之後	無反應	1.1*	4.8*	7.0*	4.3	5.9
(樣本數)		(87)	(63)	(115)		
所有樣本	傾向統一	46.6	49.0	48.8	48.1	2.2
	維持現狀	39.4	36.1	40.3	38.6	0.9
	傾向獨立	7.7*	10.2*	4.0*	7.3	-3.7
	無反應	6.3*	4.8*	7.0*	6.0	0.7
(樣本數)		(208)	(147)	(201)		

說明：*表示該細格樣本數少於 25。

資料來源：政治大學選舉研究中心，立委選舉後面訪資料。轉注自：陳義彥、陳陸輝，「模稜兩可的態度還是不確定的未來：台灣民眾統獨的解析」，頁 17。

以省籍區分的研析，發現閩南籍民眾中與以年齡區分相同的趨勢，就是老一輩的閩南籍民眾，在李登輝執政的一九九五年起，支持獨立的比率一路上揚，但年輕的兩個世代，在一九九五年起支持獨立趨勢上揚後，到二〇〇一年又略微下降，⁸⁵而外省籍民眾各世代支持統一的比率都相當高，但在李登輝執政的一九九五年起，第三代支持統一的比例卻一路下滑，顯示外省第三代的選民，對於「統一」與否，抱持著較為觀望或是模稜兩可的態度。⁸⁶

綜合以上各角度的民調分析資料會發現，由一九九五年到二〇〇一年之間，台灣獨立支持者比例的上升，標誌著國家認同的轉變趨勢，也標誌著李登輝的一九九五年起，因為各類本土化教化工作的推動，使台灣住民的國家由傳統一個中國轉向台灣獨立，但到了二〇〇一年後卻回降，論者懷疑是因經濟因素所造成，造成因素雖有待進一步研究，這與前述 TVBS 民調中呈現結果及筆者所做的推論相一致。

總的來說，陳義彥、陳陸輝的研究，與本文前所引用陸委會及其他民調調查所做出的推論吻合，而陳義彥與陳陸輝的研究中更可分離出，在省籍、年齡層、及全體民眾對於統獨的偏好，都發現支持獨立的比例在李登輝執政起就不斷的上升，後雖因民進黨執政，發生連串的失誤，使台灣人民對於台灣有無能力獨立，稍顯懷疑，使得支持獨立民意有回降情形，但不久又回升，更何況「維持現狀」再視情況決定統獨的百分比，自李登輝

⁸⁵ 陳義彥、陳陸輝，「模稜兩可的態度還是不確定的未來：台灣民眾統獨的解析」，頁 15~1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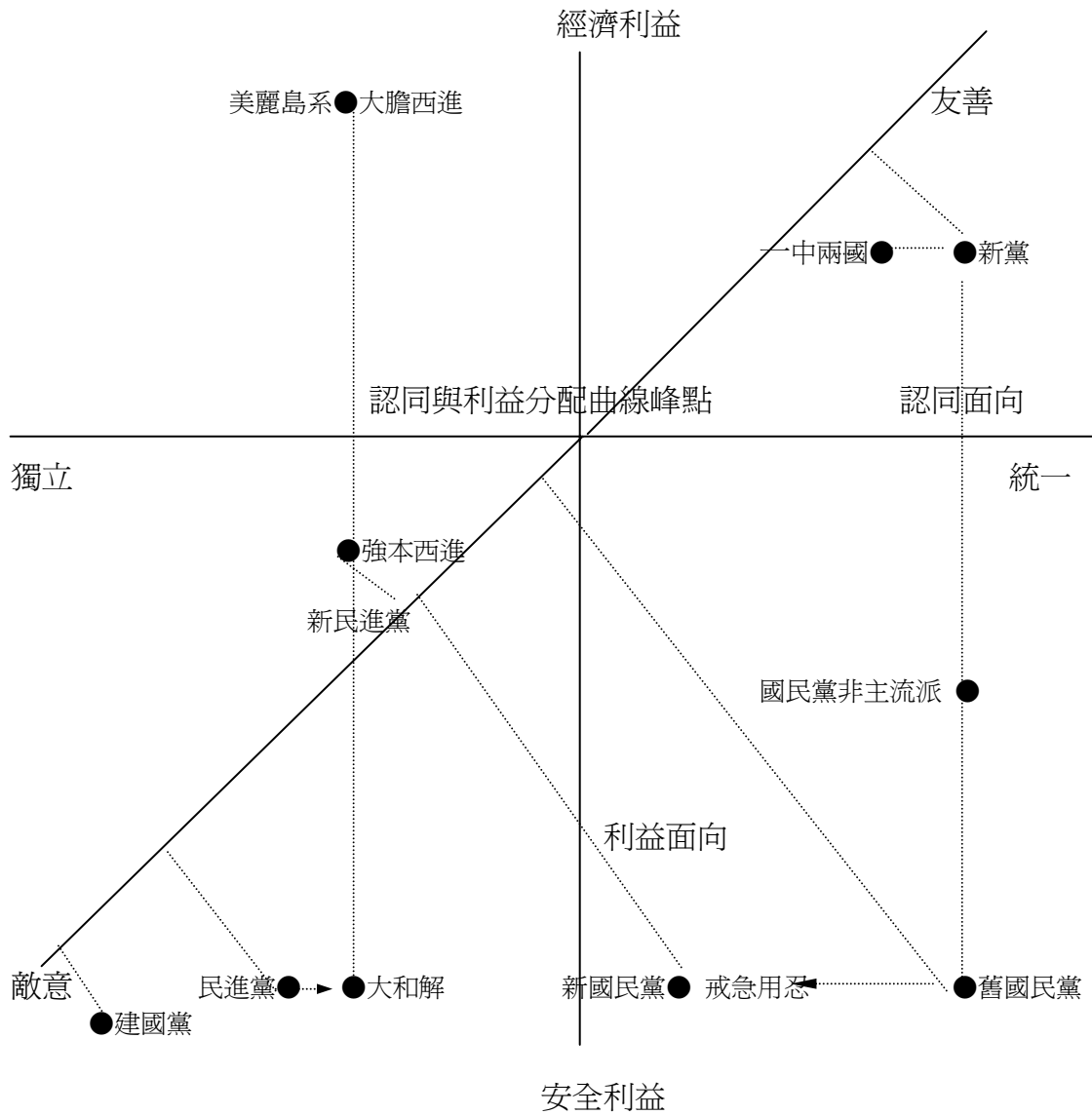
⁸⁶ 陳義彥、陳陸輝，「模稜兩可的態度還是不確定的未來：台灣民眾統獨的解析」，頁 16。

以降均維持在約三成到五成之間的絕對多數，而「維持現狀」具有拒絕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統一之強烈意涵，顯見，台灣國家認同總轉變趨勢是朝獨立，至少是不急於統一的方向轉變，但其間的轉折，經濟因素明顯成爲干擾這個趨向的重要因素。

國內學者吳玉山，利用謝復生教授對於國內各政治勢力對大陸政策主張的「議題空間模式」(issue space model)，發展出各主要政黨在國家安全、經濟利益、台灣獨立及兩岸統一所構成的四個象限中的落點，並依據選票常態分配的原理，及多年連續民意調查，發現支持維持現狀再做統一或獨立打算的民意已然成爲主流的趨勢，並認定台灣內部各政治勢力均難逃以全力吸收最大多數選票，以便掌握政治機器，實現政治理想的現實。依據吳玉山的理解，將各種政治勢力在兩岸關係主張上的「議題空間模式」標示如下：⁸⁷

⁸⁷ 吳玉山，「台灣的大陸政策：結構與理性」，包宗和等著，爭辯中的兩岸關係理論（台北：五南，1999），頁 173～192。

圖 5~3 大陸政策與兩岸關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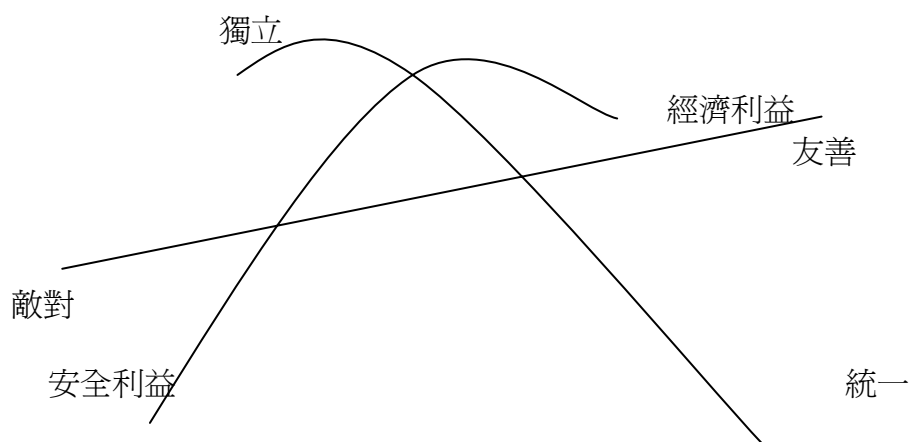


資料來源：吳玉山，「台灣的大陸政策：結構與理性」，包宗和等著，爭辯中的兩岸關係理論（台北：五南，1999），頁 190。

依據上圖，吳玉山認為台灣民眾在國家認同面向上，有統獨之爭，在利益面向上有經濟利益與安全利益之考量，兩直線的交叉點是利益分配曲線與認同分配曲線的最高峰，四十五度角斜線代表對中共態度的友善或敵對，各政黨依據各自在國家認同面向與利益面向的折衝中，各自表現於象

限中的特有落點，再由其特有落點對應到四十五度線上的位置，則是表現出各該政黨對大陸友善或敵對的政策制訂態度，因此當國民黨由兩蔣的舊國民黨時代逐漸轉向「戒急用忍」時，與中共的關係有所不同，而舊民進黨經與各政黨「大和解」到「大膽西進」的提議，再到「強本西進」成爲該黨面對大陸的政策時，各相對應於中共態度的落點自有所改變，新黨在取捨「一個中國兩個國家」的政策之間，對中共的態度改變亦十分明顯，吳玉山更強調，各政黨在大陸政策和民主政治下，各黨爭取最多數選票的選票極大化策略，與民意在認同和利益向度上的常態分配是息息相關的，若台灣愈強調統一和經濟利益，就愈能和中共建立良好的關係，愈強調台獨和安全利益就愈和中共敵對，假設民意在認同或利益向度上的常態分配改變成中間小、兩頭大的兩極化現象（換言之，是民意無法形成共識），則各黨追求多數選票的結果，會造成各黨大陸政策的分化，而非趨同。⁸⁸由吳玉山的論述中，上述的圖形應該可以用立體的圖像加以進一步理解，那就是國家認同面向的統獨爭議與利益面向的兩條線應該是呈常態分配曲線的交叉，所以在交叉點才有「利益分配曲線」與「國家認同曲線」的最高「峰點」的出現，敵對與友善則呈現在直線的兩端，如下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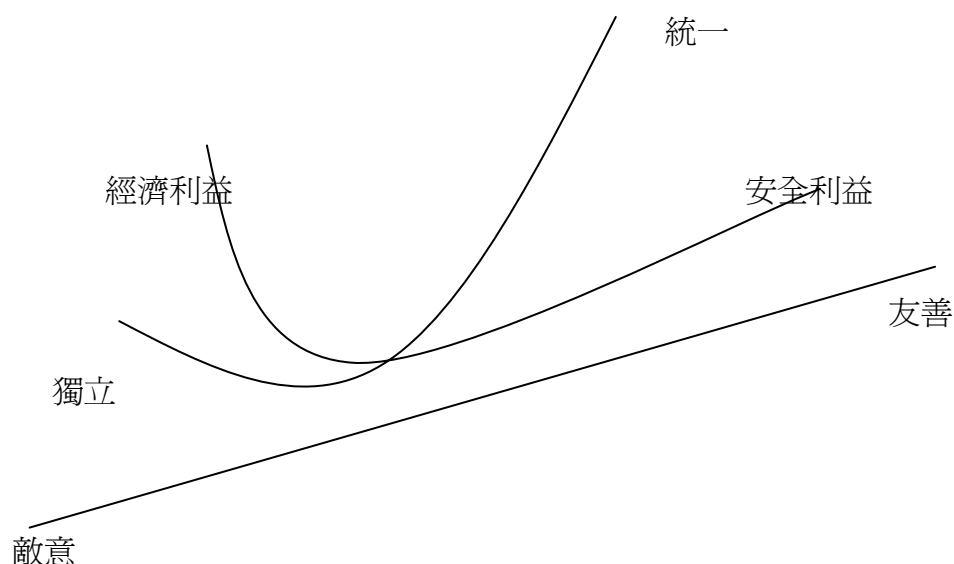
圖 5~4 認同與利益峰點



⁸⁸ 吳玉山，「台灣的大陸政策：結構與理性」，頁 189、192。

假設民意分配趨勢是呈現中間小、兩頭大的分配，就應以下圖的方式表達：

圖 5~5 認同與利益谷點



在吳玉山的分析中，雖因當時未有親民黨的成立，以致於沒有對親民黨的分析，但吳玉山卻已經由這個分析圖表中，清楚的表達了各政黨考量兩岸關係策略的過程，那必然是以選民對於國家認同應該統一或獨立、經濟利益及國家安全等因素中，考量對於該政黨的支持與否，各政黨則以依據選民的傾向，以選票極大化策略作為最重要的政策制定考量依據，以便爭取最大多數選民的支持並執行，又由執政制訂兩岸關係回應民意要求，以利繼續執政，如此週而復始從不間斷。以台灣統獨爭論之激烈，並已經成為選戰中重要的訴求環境中，當某種國家認同的態度成為台灣的主流民意時，執政的政黨所執行的大陸政策，自然跟隨國家認同的轉變而轉變，兩岸關係也更隨著這種轉變而轉變。所以在前述有關國家統獨的民調中，所呈現有關統獨所表現的國家認同，不論在省籍、在世代都有偏向台灣獨立的趨勢時，各政治菁英在選票極大化策略下就不得不表現對於與主流民意相符合的國家認同觀點，所以在二〇〇四年總統大選時，連戰有主張台

灣可以是一邊一國或主張大幅修憲，⁸⁹宋楚瑜更公開表示國親修憲的三原則是「一二三」：「單一國會、兩輪多數決總統制及三權分立」，⁹⁰而單一國會、三權分立的修憲方式，事實上是對中華民國傳統五權憲法的修訂，與民進黨主張已然重疊，其偏離傳統一個中國認同，至少是偏離傳統一個中國認同中制度認同的軌跡極其明顯，目的除了對現有憲法的修訂以提升憲法的周延性與運作能力外，並無法完全排除政黨為了符合主流民意偏向台灣是一個主權獨立國家的思維模式，極力讓所屬政黨選票極大化的目的。

又國內學者童振源在二〇〇一年時，曾將李登輝、陳水扁、連戰、宋楚瑜等四人在二〇〇〇年總統大選時的中國政策，依據三個領域及兩個時間向度，做出如下的歸類：⁹¹

表 5~7 李、陳、連、宋中國政策對照表

時間	中華民國政府 合法性	兩岸關係定位	台灣國際定位
現在	李：台灣 扁：台灣 連：台灣 宋：台灣	李：一國（特殊關係） （~1999） 李：二國（特殊關係） （1999~） 扁：二國（特殊關係） 連：二國（特殊關係） （1999~） 宋：二國（特殊關係）（1999~）	李：二個中國 扁：一中一台（~1999） 扁：二個中國（1999~） 連：二個中國 宋：二個中國
未來	李：中國 扁：台灣共和國或中國 連：中國 宋：中國	李：一個中國 扁：一中一台或一個中國 連：一個中國 宋：一個中國	李：一個中國 扁：一中一台或一個中國 連：一個中國 宋：一個中國

註：李：李登輝；扁：陳水扁；連：連戰；宋：宋楚瑜

⁸⁹ 請參閱第四章相關論述，

⁹⁰ 聯合報，中華民國九十二年十一月二十四日，版 A。

⁹¹ 童振源，「『一個中國』原則的戰略性思考」，台灣主權論述論文及編輯小組編，台灣主權論述論文集（上）（台北：國史館，2001），頁 354。

童振源認為隨著台灣民主化後，「現在」的中華民國合法性都來自台灣，與過去兩蔣時代來自全中國有所不同，李登輝、陳水扁、連戰及宋楚瑜在中華民國合法性上相差不遠，但在台灣國際定位及隨之而來的兩岸關係定位上，則呈現陳水扁與一九九九年發表「特殊國與國關係」後的李登輝較為接近，對於「未來」的展望，童振源認為李登輝在追求「一個中國」，並認為陳水扁在當選總統後，避談「特殊國與國關係」，及民進黨通過「台灣前途決議文」，顯示陳水扁對於台灣的國際定位是「兩個中國」，⁹²但在李登輝於二〇〇〇年卸任後的言行卻是表現十足的台獨傾向，並組織「台灣團結聯盟」強烈主張台灣應該獨立，陳水扁更於二〇〇二年八月三日公開表示追求「一邊一國」的決心，二〇〇三年時，連戰與宋楚瑜這組總統候選人也公開贊成「一邊一國沒甚麼不可以」，並表達在台灣是主權獨立國家基礎上，視情況追求兩岸的統一或獨立，這種發展與童振源的論述在李登輝的部分顯有不同，顯然是因為童振源在撰寫前文時，李登輝、陳水扁尚未有如此強烈的追求台獨言行，連、宋態度亦曖昧不明所致；而李登輝對於台灣現在的定位與未來的主張顯然是與陳水扁接近的，那就是追求一中一台的台灣獨立。在總統選舉中所追求的當然是最大多數選民的認同，這種殘酷的現實，形成童振源所分類中的「現在」情勢，必須讓中華民國政府與台灣這個疆域緊密結合，這種嚴酷的情勢造成在「現在」的情勢下，連戰不敢否認李登輝「特殊國與國關係」調子而主張邦聯模式，宋楚瑜則把兩岸關係定位為相對主權的準國際關係，主張簽訂三十年互不侵犯和平協議，然後兩岸各以主權國家身份仿效歐盟模式二十年；陳水扁雖在主政之初，不得不以「兩國論」做為大陸政策的基調，以免過渡刺激國內外情勢，但仍主張兩岸是互不隸屬、統治、管轄的兩個主權國家的特殊關係，認為接受包括政治性議題談判、推動兩岸直航、強調任何欲改變現狀的決定，應經由台灣人民同意；顯然三組候選人都與北京政府的「世上只有一個中國，中華人民共和國是唯一合法代表，台灣是中國的一部份」

⁹² 童振源，「『一個中國』原則的戰略性思考」，頁 355～356。

立場相差甚遠，此種現象，可以解讀為：台灣選民的民心向背，與北京政府的期待相去太遠；三組候選人所欲捕捉的主流民意，是欲與中國保持距離，⁹³所以學者冷則剛指稱，由於選舉的牽制因素，執政及反對兩大陣營均以勝選為制定兩岸政策的優先考量，在「台灣優先」、「全球佈局」等大的政綱方向將不會有顯著差異：執政與在野政黨都在尋求選票極大化的結果。⁹⁴隨著國家認同的轉向，目前台灣的主流民意，顯然是願意將台灣與中國保持距離，維持現狀，後又因陳水扁二〇〇〇年的勝選及二〇〇四年的連任成功，正代表著台灣未來進一步走向獨立，已經更加成為台灣民意的主流，而主張與中國大陸保持距離的主流民意，也將迫使當選者依循，並以此民意基礎做出兩岸關係的決策，否則，當選總統者，將受台灣主流民意的掣肘，而不遵守台灣在國家認同上已經逐漸向台灣獨立傾斜的台灣主流民意，則無當選的機會，以二〇〇四年總統大選時為例，台灣有百分之六十七的選民表示會將候選人的國家認同態度，列為投票的考量因素，⁹⁵若候選人不考量主流民意的統獨走向，則不受選民支持，更遑論可以主政並主導兩岸關係了。

在選票極大化的策略下，各政黨都必須依循主流民意而相互競爭，任何政治菁英在勝選執政後就自然受主流民意的牽制與監督，在台灣若主流民意在國家認同上已經朝台灣獨立方向前進，那麼任何主政者都必須依循這種民意與大陸發展出特定形式的兩岸關係。

第三節 兩岸關係中的國家認同因素

兩岸關係的演變，由兩蔣時代的互不往來到一九九二年至一九九五年期間的緩和，再到政黨輪替後的兩岸關係緊張，是明顯而易見的，這過程到底與國家認同有何關係？這種因果關係的確立，也就是本論文的精髓所

⁹³ 台灣教授協會，「對所謂『一中』問題的批判」，台灣主權論述資料選編小組編，台灣主權論述資料選編（上）（台北：國史館，2001），頁 291~292。

⁹⁴ 請參閱冷則剛，「總統大選與 2003 年兩岸關係」，張貼於：<http://www.twpolitics.com/fire/a2.asp?messageid=233> 網站。

⁹⁵ 聯合報，中華民國九十二年十月二十日，版 A3。

在。

中國大陸在一連串的改革開放後，一個不可否認的事實是，改革開放以來，中共賴以統治國家的意識型態即馬克思主義與毛澤東思想一直處於不斷衰退的狀態，自九〇年以來，這個意識型態集合體已失去和社會的關連性，更為嚴重的是，中共不能借用這個原來的意識型態群控制其官員與幹部行爲，因此，中共必須尋找新的控制機制作爲取代，其中，新民族主義是中共「強國家心理」(strong-state-complex)作祟下，強化了中共以反抗列強過去侵略爲職志的選擇，⁹⁶台灣是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向來是中國大陸主政者不變的政策⁹⁷，使台灣「重回祖國的懷抱」更成爲「強國家心理」下所不能妥協的事物，並已內化成爲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認同的一部份，而新民族主義因中國大陸繼續深化與廣化的改革開放，遂成爲大陸民意的主流時，對於將台灣再一次納入傳統中國的版圖，讓現有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制度更加完善（讓制度充分實行於包含台灣在內的全中國領土內），是被大陸最大多數的人民所認同，這種不讓台灣獨立出去的意圖，就成爲中國共產黨面對台灣問題時的唯一選擇，更何況，中共爲避免因提倡民族主義造成大陸各民族的分離，遂將民族主義轉化成愛國主義，⁹⁸當「使台灣重回祖國的懷抱」的選擇，面臨台灣以國家認同的轉變作爲對大陸政策支柱進行與大陸的對抗時，就直接衝撞了中共近年所強調的「愛國圖騰」，甚至危及其統治合法性，中共自然會依恃改革開放所帶來日漸壯大的經濟、政治力量，加強對台灣的壓迫，而無從避免。

從中共十二大到十六大的政治報告中，有關對台部分的對照，可見兩岸關係變化的端倪：

⁹⁶ 鄭永年，「中國新一波民族主義」，林佳龍等主編，民族主義與兩岸關係-哈佛大學東西方學者的對話（台北：新自然主義，2001），頁 25~29。

⁹⁷ 中共國務院台灣事務辦公室與新聞辦公室，於一九九三年八月三十一日，同時以七種語言對外發表的對台重要政策性文件「台灣問題與中國之統一」白皮書，就明白指陳台灣問題的由來與至今無法解決，「美國政府是有責任的」，顯見中共對於「外力介入使台灣自主國分離出去」的「定見」不容隨意更動。

⁹⁸ 鄭永年，「中國新一波民族主義」，頁 30。

表 5~8 中共各屆黨代表大會政治報告有關對台政策內容對照表

屆次	對台內容重點
十二大 (1982)	無
十三大 (1987)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努力爭取和平解決台灣問題，按「一國兩制」完成祖國統一的構想和實踐，是中華民族政治智慧的偉大創造。
十四大 (1992)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促進兩岸直接通郵、通航、通商。 ● 中國共產黨願意與中國國民黨儘早接觸，以便創造條件，就正式結束兩岸敵對狀態、逐步實現和平統一進行談判。 ● 在「一個中國」前提下，與台灣甚麼問題都可以談。
十五大 (1997)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堅持「和平統一、一國兩制」方針和發展兩岸關係、推進祖國和平統一進程的八項主張。但不能承諾放棄使用武力。 ● 堅持「一個中國」原則，反對分裂、反對台獨、反對製造「兩個中國」及「一中一台」。 ● 反對外國勢力干涉，絕不允許任何勢力以任何方式改變台灣是中國一部份的地位。 ● 在「一個中國」原則下，正式結束兩岸敵對狀態，進行談判，並達成協議。
十六大 (2002)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堅持「一個中國」原則，世界上只有一個中國，大陸和台灣同屬一個中國，中國的主權和領土完整不容分割。 ● 堅決反對任何製造台灣獨立、兩個中國、一中一台的言行。 ● 在「一個中國」的原則和基礎上，暫時擱置某些政治爭議，儘早恢復兩岸對話和談判。 ● 堅持「和平統一、一國兩制」方針和發展兩岸關係、推進祖國和平統一進程的八項主張，努力爭取和平統一，但絕不承諾放棄使用武力。 ● 台灣問題不能無限期拖延下去。 ● 在一中前提下，可以談正式結束兩岸敵對狀態、台灣地區的國際空間、台灣當局政治地位。

資料來源：「中共十二大至十六大政治報告有關對台部分的對照」，中國時報，民國九十一年十一月九日，台北，版 3。

由各屆中共黨代表大會對於台灣問題的內容做出分析約略可有如下的特徵：

一、由十二大的無內容，到十六大的七項內容，顯然中共對台灣問題越來越重視。

二、由十三大的僅有原則性的統一宣示，到十六大的更具體作為規定，充分展現中共對台統一的決心與迫切性。

三、延續「江八點」的對台指導，胡錦濤對台政策也將以此為基調。

將新三段論：「世界上只有一個中國，大陸和台灣同屬一個中國，中國的主權和領土完整不容分割」字句正式寫入黨的報告中。

中共對台的政策主張，也從毛澤東時期的血洗台灣、解放台灣，到鄧小平的「一國兩制」，經過江澤民的「江八點」，再到中共十六大的「新三句」與「三個可以談」，由「民進黨等同於台獨」，到「聽其言、觀其行」，再到「除了極少數製造分裂的台獨人士外，廣大的民進黨員都可以到大陸參訪」的轉折，顯見中共「統一」台灣的政策基本精神始終不變，但是手段卻愈顯靈活，這些轉變也顯示中共對台灣問題必須遵守「一中原則」、「台灣主權屬於中國」、「和平統一」及「一國兩制」等，不會因為台灣國家認同的轉變而有所更動，換言之，中共對台政策基調不變，但對推動統一工作卻因時空環境的不同，尤其是台灣國家認同更朝向台灣獨立方向發展時，變得更加富有彈性是可以確定的，這突顯出兩岸關係中大陸的一方立場不變，台灣一方對大陸政策的轉變，就成了改變兩岸關係的關鍵，而台灣的立場變化，又以台灣內部國家認同的轉變最具決定性的力量。這種台灣國家認同深切影響兩岸關係的觀點，與外國學者高敬文（Jean-Pierre Cabestan）的見解相似。

高敬文認為，近年來影響台灣大陸政策的四個主要因素：⁹⁹

- 一、台灣經濟對大陸的依賴。
- 二、台灣民主化。
- 三、中國大陸國力日漸提升。及
- 四、中國大陸對全球影響力的提升等等。

其中第一、三、四項因素，使大陸日漸有力的框住台灣國際活動空間，這使得第二個因素—「台灣民主化」成為決定台灣是否願意就範於中共所設框架的因素。台灣在一九八七年以前只有一種大陸政策，就是國民黨以中國必須統一在孫中山三民主義之下的政策，之後大陸政策又分為「國民

⁹⁹ Jean-Pierre Cabestan, "Taiwan's Mainland Policy: Normalization, Yes; Reunification, Later" in David Shambaugh, ed., *Contemporary Taiwan*, p. 228.

黨主流派以台灣優先但不獨立政策」、「新黨（及國民黨非主流派）的和解政策」及「民進黨的獨立政策」，一九九三年之後，台灣政府被以民進黨為代表的獨立政策，及以新黨為代表的和解政策所壓迫，¹⁰⁰形成另一番局面的兩岸關係，而台灣民主化所牽涉的制度認同轉變，及在政治菁英操縱下所產生的文化認同與族群認同轉變的問題，就是形成壓力的來源，換言之，台灣國家認同的轉變就決定了台灣的大陸政策設定，而大陸政策的設定又決定了兩岸關係的呈現。

以中共的立場看，統一台灣的工程，中共確實對時間因素充滿矛盾，一方面，中共發現時間拖久，可能不利於兩岸的統一，因為時間拖長後，台灣對大陸有感情、有親身經驗的老一代逐漸凋零，台灣近年來不斷強化台灣意識的政治化教育，灌輸台灣優先、台灣生命共同體、新台灣人的理念等等，削弱了中國的情節，同時台灣民主多元社會的建立，也使得台灣的命運無法由一黨一派或一人所掌握，這些發展使兩岸的統一平添變數。但另一方面卻是時間拖長，使得中共在國際上擁有更大的影響力，在經濟上取得更大的成就，相對的使台灣在經濟與政治上與大陸抗衡的籌碼不斷的喪失，而台灣終將屈服於中共的壓力。¹⁰¹國內長期研究兩岸關係的智庫單位「中華歐亞基金會」，在二〇〇一年十月間，提出報告也稱，重新審視兩岸關係的發展可以發現，影響兩岸關係的因素主要有：¹⁰²

- 一、台灣與大陸內部的政治經濟環境；
- 二、國際因素；
- 三、兩岸政府各自的政策與策略；
- 四、兩岸民間各種層次的交流；
- 五、台灣與大陸的歷史情感與文化因素。

其中台灣的政經局勢是制訂大陸政策最直接的環境，歷史感情與文化因素是制訂政策的心理因素，當然必須參酌大陸內部發展因素、國際因素

¹⁰⁰ Cabestan “Taiwan’s Mainland Policy: Normalization, Yes; Reunification, Later”, pp. 229~231.

¹⁰¹ 林文程，「外在環境發展對台灣國家定位之影響」，黃昭元主編，兩國論與台灣國家定位（台北：學林，2000），頁 426~428。

¹⁰² 中華歐亞基金會編印，兩岸關係的結與解總結報告（台北：中華歐亞基金會，2001），頁 2。

及兩岸民間交流因素等，這其中明白的說出，台灣的政治、經濟及台灣與大陸的歷史感情與文化因素，是制訂大陸政策的基礎。而對於大陸的歷史感情與文化因素，正是台灣國家認同變化的重要一環。

國外的學者認為，一個國家建立的四個步驟是：¹⁰³

- 一、建立國家象徵，如國旗、國歌等等。
- 二、建立政府機關，而百姓可得到平等的法律對待，及參與政治的權利等。
- 三、教化人民認同這個國家。
- 四、以歷史的光榮強化人民的認同。

若以這個條件看在台灣的中華民國，由兩蔣時代，經李登輝到陳水扁，其中國家象徵沒變、政府機關制度在李登輝修憲起開始了極大的變化，對人民的教化與國家的光榮事蹟，也是由李登輝開始轉變，總的來說，中華民國這個國家，由兩蔣到陳水扁，除了國家的象徵，如國號、國旗尚未改變之外，其他的政府機關、人民教化內容及歷史的光榮事蹟都已經徹底的改變，時至二〇〇三年在總統大選壓力及選票極大化政策下，藍、綠兩大陣營對於台灣國家認同轉變的體認，轉而競逐最大多數選票同時，兩黨都堅決主張應該台灣優先、台灣第一、修憲、公投、一邊一國等，使得尚存的國家象徵也時時面臨被改變的命運。

再就主權確實涵蓋範圍，組成的人民等因素分析，現今在台灣的中華民國，與孫中山先生所創造的中華民國基本上是不同的兩個國家，以此標準看，現今在台灣的中華民國或許該稱為一個「新而獨立的國家」，這個新而獨立的國家，自然與大陸發展出不同於以往因內戰戰敗而退居一隅的中華民國與大陸發展出來的關係。因此，有國外學者認為李登輝時代，台灣設定的短、中期兩岸關係目標是逐漸的正常化（gradual normalization），而非追求統一（reunification），¹⁰⁴到陳水扁時代就是依據李登輝時代所設定的目標，進一步追求兩岸的國際關係，而關鍵之所在，除了領導者自身

¹⁰³ Anthony H. Birch, *Nationalism and National Integration* (Boston: Unwin Hyman, 1989), pp. 9~10.

¹⁰⁴ Cabestan, "Taiwan's Mainland Policy: Normalization, Yes; Reunification, Later", p. 217.

的意識型態之外，領導者本身及其所代表的政黨，受台灣內部對於國家認同轉變所形成的選票分佈壓力，更是推動這一轉變的最重要因素。這種關係，形成了政治菁英意識型態領導國家認同政策的走向，民眾接受國家認同的走向並形塑特定的國家認同傾向後，反過來箝制政治菁英的政策制訂，如此週而復始，終於形成特定的兩岸關係。

基於前述國家認同民意的展現，直接影響兩岸關係的論證，兩岸關係必然隨著台灣國家認同的轉變而有強烈的因果關係；曾經主管我國最高安全機構的前國家安全會議秘書長丁淦洲，彙整自一九四九年分裂迄今的兩岸關係為四個時期：¹⁰⁵

一、軍事對抗時期

自一九四九年的古寧頭戰役起，經一九五四年第一次金門砲戰、一九五五年一江山戰役，到一九五八年的八二三砲戰止，及之後的小規模戰鬥，但因中共無力進犯台灣本島，使兩岸形成長期對峙。若以國家認同的變化與兩岸關係的變化做成對照表，可作如下的呈現：

表 5~9 1970 年代以前國家認同轉變與兩岸關係對照表

年份	國家認同轉變	兩岸關係
1945.10.25	台灣人民熱烈歡迎祖國。	台灣是中華民國之一部分。
1947	二二八事件爆發；隨後廖文毅在日本，以老一輩受過日本教育的台灣人為主，組成「台灣國臨時政府」掀起海外台獨運動，後王育德等人另組台灣青年社，其勢力擴及美國，形成今日的台灣建國聯盟。以台灣獨立做為國家認同的目標。台灣島內台灣獨立勢力遭壓制。	台灣是中華民國的一部份，在北京的中華民國中央政府在台代表，全力在台執行再社會化(re-socialization)台灣民眾成為中國人任務，要求台灣民眾認同「中華民族」、「中華民國制度」及「中華文化」。兩岸是當然的國內關係。
1949	國民政府來台，以黨、政、軍、特力量，積極整頓、掌控台灣，利用文化教育管道改造台灣人成為中國人，壓制防範台灣意識或獨立意識的成長。	兩岸延續國共內戰形式，維持軍事對峙，互爭正統地位；兩岸關係雙方互相同意為「國內關係」。
1950.1960年代	台灣省議會藉由郭雨新等黨外人士維繫台灣人反抗意識，一九六〇年，雷震試圖結合外省人與本省人組成政黨，卻以失敗收場。一九六四年，彭明敏等發表	兩岸互爭法統與合法代表權，五〇年代早期小規模軍事衝突不斷；一九五四年韓戰結束，美國與

¹⁰⁵ 丁淦洲口述、汪士淳撰寫，丁淦洲回憶錄（台北市：天下遠見，2004），頁 465~466。

	<p>「台灣人自救運動宣言」，表示台灣唯有建立一個新而獨立的國家才能自救。這份宣言在國內被鎮壓，在海外卻獲共鳴，使許多留學生加入台獨陣營。島內國家認同因為海外台獨訴求雖有所轉變，但變化不大。</p>	<p>我簽署「共同防禦條約」，確保台灣受美國武力保護地位，一九五八年十月美國與我政府發表「聯合公報」，我光復大陸非憑藉武力，而是三民主義，正式與大陸進行制度認同競爭；一九六六年中共文化大革命爆發，台灣更進行文化復興運動與中共進行文化認同的競爭。</p>
--	---	--

作者自行製作

此時期的兩岸關係是內戰的延續，台灣的國家認同傾向以一個中國為目標，且在國民黨強力控制主導下，台灣國家認同以一個中國為主軸，面對中共。在此期間，初期，明顯的是退守台灣的中華民國意圖以軍事力量光復大陸，中共亦企圖以軍事力量「解放」台灣，後期在主客觀因素影響下，台灣逐漸放棄以武力恢復對大陸的統治權，但中共始終不放棄以武力統一台灣的政策。

二、法統爭執時期

一九七一年中華人民共和國進入聯合國，並以中國唯一合法政府自居，將台灣納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部份，強力排除中華民國的國際地位，這種態勢一直延續迄今。若以國家認同的變化與兩岸關係的變化做成對照表，可作如下的呈現：

表 5~10 1970~1980 前期國家認同轉變與兩岸關係對照表

年份	國家認同轉變	兩岸關係
1970年代	<p>一九七〇年以前，台灣政治運動是隱藏的，七〇年後逐漸浮現明顯。七一年中華民國退出聯合國，迫使台灣人重新思考台灣的定位。七五年的台灣政論、七七年、七八年的台灣鄉土文學論戰，七七年中壢事件，七九年美麗島雜誌發行，最後爆發美麗島事件。此期間，國民黨政府在國家認同塑造上，大體仍被最大多數台灣民眾所接受。</p>	<p>國際主流社會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並將台灣視為其一部份。國民黨的傳統一個中國國家認同，備受以台灣獨立為最終訴求的國家認同挑戰，但仍堅持與中共法統的爭奪。</p>
1980年代中期以前	<p>經由雜誌八〇年代、博觀、深耕、鐘鼓鑼、關懷、前進、開創、新潮流、政治家、自由時代等等，將台灣意識不斷提升，終於展開了中國結與台灣結的辯證，伏下日後統獨的論爭。因國際局勢</p>	<p>一九七九年蔣經國提出「三不政策」，一九八〇年主張「三民主義統一中國」，這兩政策成為對大陸政策主流。對大陸政策由積極的否定大陸政權，轉為</p>

	<p>的惡化，國民黨政府的國家認同正當性逐漸被民眾質疑，台灣獨立的訴求在台灣內部逐漸浮現。國民黨所主張的一個中國國家認同在島內喪失極大部分支持力量。</p>	<p>消極的承認大陸政權，也拒絕與大陸政權接觸，並寄望於大陸內部的和平演變，自動接受並服膺三民主義。 台灣推動務實外交，兩岸關係由國內關係逐漸為轉為國際關係鋪陳基礎。</p>
--	--	---

作者自行製作

此時期的國家認同走向，是執政的國民黨，以強有力的對內統治，壓制台灣內部國家認同走向台獨一端的傾向，對外則強力與中共互爭中國代表權，因對外爭取中國唯一代表權的失敗，國家認同走向也逐步自一個中國退卻。台灣內部逐漸浮現對於國民黨一個中國認同的不滿，最終難以壓制，兩岸關係進入新的紀元。

三、開放交流時期

一九八七年中華民國政府開放赴大陸探親，並擴大到經貿、學術、科技、觀光等領域的交流；一九九二年兩岸兩會各自成立，一九九三年四月在新加坡舉行第一次辜汪會談，一九九八年辜振甫赴陸訪問，汪道涵也計畫於一九九九年來台回訪，兩岸關係有重大進展。若以國家認同的變化與兩岸關係的變化做成對照表，可作如下的呈現：

表 5~11 1980~1990 國家認同轉變與兩岸關係對照表

年份	國家認同轉變	兩岸關係
1980 年代後期	<p>一九八七年，二二八和平促進會要求平反二二八，象徵台灣人心靈的重建，以及當家作主的信心。八九年鄭南榕自焚，突破公開談論台獨的禁忌；八九年立委選舉，有些民進黨候選人提出建立台灣為新國家的主張，標示台灣已經進入另一個運動和國家認同的階段。島內反對一個中國認同已成為風潮。</p>	<p>一九八〇年代晚期已不再堅持與中國大陸爭奪法統。 一九八七年解嚴，事實上是不再視中共為叛亂團體。台灣執政者將兩岸關係朝對等的政治實體方向發展。</p>
1990 年代	<p>李登輝接任蔣經國為中華民國總統，主導多次修憲，使中華民國在領土、國民、政府等等國際法人的條件上，都構成獨立的國家。 持續推動台灣國家認同的轉變，相繼有：台灣人的悲哀、外來政權、新台灣</p>	<p>雖於一九九一年頒佈「國家統一綱領」，一九九二年凝聚「一中各表」共識，營造兩岸四年間的關係緩和與熱絡，在解除戒嚴承認中國大陸為「政治實體」的基礎上，向承認中國大</p>

<p>人、修憲、凍省、兩國論等等言論的提出。一九九一年，國民黨廢除動員戡亂，在憲法層面上承認中共為政治實體；發生獨台會事件，保護十三行文化運動，一〇〇行動聯盟廢除刑法一百條行動，民進黨通過台獨黨綱，台獨聯盟遷盟回台，國民黨獨台路線，一中一台與一個中國政策的爭論，地方政府實施鄉土教材，外省人獨立促進會成立，這些都在追求台灣地位的重新確立及台灣新文化內涵。</p> <p>總統直選，彰顯台灣主權獨立地位。</p>	<p>陸為「另一個國家」方向大步邁進。兩岸關係逐漸由國家內部關係轉為國際關係。</p>
---	---

作者自行製作

此時期，在李登輝領導下，島內反對一個中國認同已成為風潮，到了一九八〇年代晚期已不再堅持與中國大陸爭奪法統，並於一九九一年進行修憲進一步反映民意落實台灣為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在逐步承認中共統治大陸的現實中，意圖基於中共有效統治大陸的現實，發展與大陸的國與國關係，但因迫於形式最後僅能以「特殊國與國關係」加以描述，以避開國際社會、國內統派力量及中共的強大壓力。其間九二年雙方談判的共識，以模糊的一個中國政策為交流的基礎，形成九二年到九五年兩岸關係幾十年來最緩和的情況，但在九五年李登輝出訪美國及九六年總統大選突顯台灣主權獨立，再到一九九九年進一步提出兩國論，明確表達台灣民眾國家認同意向時，兩岸關係又再度跌入冰點。其間的轉折，乃在國家認同轉變的體現。

四、主權之爭時期

九九年七月九日，李登輝發表「特殊國與國關係」，中共汪道涵取消來台，同時也終止兩岸兩會的交流管道。陳水扁隨後於二〇〇〇年以「四不一沒有」的就職演說詞，換得中共「觀其言、聽其行」的政策，讓兩岸關係緩和，但隨後於二〇〇二年八月提出一邊一國，二〇〇三年提出制憲、公投立法、防衛性公投等，迫使中共再次宣稱，不惜一切代價阻止台獨的決心，兩岸關係再度緊張。若以國家認同的變化與兩岸關係的變化做成對照表，可作如下的呈現：

表 5~12 1990 迄今國家認同轉變與兩岸關係對照表

年份	國家認同轉變	兩岸關係
1999 年	李登輝發表「特殊國與國關係」獲得台灣民意高度支持。	自一九九五、一九九六年文攻武嚇逐漸緩和的兩岸關係再度緊繃，將原本計畫來台的海基會會長汪道涵行程取消，兩岸關係在政治、軍事與外交等政府主導的領域內，全面中斷，兩岸關係再度緊張。
2000 年 迄今	由主張台獨的陳水扁繼任總統，李登輝卸任後公開支持台灣獨立。 2004 年，陳水扁連任成功，宣稱是台灣主體意識所致，泛藍總統參選人連戰公開贊同修憲與「一邊一國」，進一步附和民進黨的台灣獨立認同。	陳水扁以統身份卻拒不擔任國統會主委，停開國家統一委員會，公開呼籲「一邊一國」。中共將陳水扁政府的言行指為彌天大謊，對於台灣執政者不再心存希望，兩岸關係更加倒退。台灣執政者立足准國際關係並亟力將兩岸關係定位為國際關係，兩岸關係僵局難以打開。

作者自行製作

此時期，台灣內部國家認同出現重大轉變，贊成台灣獨立於中國之外的民意高漲，使得中共不得不加緊壓縮台灣國際活動空間，加緊向台灣表達絕不讓台灣獨立出去的決心，因中共的壓縮，又觸發台灣追求獨立決心，台灣執政者更在主觀上決定將兩岸關係，由準國際關係向正常國與國間關係邁進，使得兩岸尖銳對立。

兩岸關係大體來說，是從蔣中正時代兩岸互相否定對方，到蔣經國時代晚期事實承認中共統治大陸，到李登輝時代的前、中期時，則因台灣民主化、自由化，及中共改革開放逐步收到成效，使得兩岸對於兩岸關係的發展，都認為時間是對他們有利的，中共方面認為，只要能防止台灣獨立，待其內部的改革完成，台灣對於社會主義的疑懼就會消失，統一大業就可水到渠成，台灣方面則認為，只要時間拖得夠久，中共在和平演變壓力下，終將成為市場導向與民意監督的世俗政權，¹⁰⁶那麼就可與大陸進行統一談判，但自李登輝時代後期開始到陳水扁時代，兩岸對於時間的詮釋又各自呈現：大陸大致秉持認為將改革發展搞好，再回頭箝制、吸引台灣納入中

¹⁰⁶ 石之瑜，當代台灣的中國意識，頁 307。

國體系的戰略，且隨大陸改革開放成功，更堅定這種戰略設定，而台灣卻因不斷的強調本土化與台灣化，並從教育與政治社會化中過程，將台灣人民對於國家的認同從傳統的中國認同，逐步轉向只限於對臺、澎、金、馬的認同；大陸一直將兩岸關係定位為國內關係，而台灣認為兩岸關係由「國內關係」轉往「國際關係」，使得兩岸關係發生了根本的質變，仔細分析期間的轉折，不難發現台灣內部「國家認同」的轉變，就是台灣執政者將兩岸關係認定為「國內關係」或「國際關係」中不可忽視的核心因素，而台灣執政者對於兩岸以國內關係或國際關係的定位，就決定兩岸關係面貌的呈現。

台海兩岸的關係，自古以來都有分離或統一的拉鋸，現今的台海關係這種拉鋸更是明顯，對於國際上分離勢力的研究，可用的研究途徑，不外：反對分離者，認為除了某些情況下，才可允許分離；贊成分離主義者，認為只要情況允許便支持分離；既不支持也不反對者，認為經過審慎評估，才能決定允許分離。這些途徑又簡單的劃分為以允許分離為基礎的自由主義觀點，及不隨便允許分離的社群主義兩類，若就自由主義的觀點看，又可分為兩個派別，一派對分離的條件設限較嚴格，如發生不義的征服、剝削、種族滅絕、及文化消失的威脅等，另一派不但同意有分離的權利，甚至完全容許單方面分離的權利。¹⁰⁷ 依此論點，台海兩岸對於台灣是否應該自中國分離出去的主張，應該可以劃分為，中國大陸以社群主義為基礎，堅決反對台灣的分離，台灣內部又可依據各自統獨的政治主張，歸類為極端自由主義，主張無條件的分離或統一、設限的自由主義，主張有條件的分離或統一，甚至還有社群主意者完全主張不能分離，在台灣內部甚難取得共識，而對已經民主化的台灣人民，主張「分離」，「有條件分離或統一」，及主張「統一」的各方支持者，各自以各種理由自由結合，以主張自己的「無過失分離權利」(no-fault secession)，¹⁰⁸ 甚或「無過失統一權利」，幾乎完全不需要證明其主張的正當性，就可堂而皇之大聲疾呼兩岸統一或獨

¹⁰⁷ Lehing, 許雲翔等譯，分離主義的理論 (Theories of Secession)，頁 2~3。

¹⁰⁸ Lehing, 許雲翔、江佩娟、葉錦娟、劉中文等譯，分離主義的理論，頁 4。

立不虞遭受迫害。

雖然台灣與中國大陸之間的探親、旅遊、就學、商務與各類交流活動，百年來從來沒有像現在一樣的高潮，但是經濟與政治的發展卻是背道而馳，即兩岸官方敵對、民間友好；政治緊張、經濟熱絡；既和平互利，又武裝對抗。¹⁰⁹兩岸之間，呈現的是政治疏離、經濟整合的現象，而台灣內部各政黨間對於大陸與台灣如何界定關係，相互有所堅持，執政的民進黨內部也無力做出有效整合¹¹⁰，在此困境下所呈現的兩岸關係，有研究者稱之為「政經背離下的缺乏共識」，而共識與否的核心問題就是「一個中國」是否被接受的問題，國內對於是否應該接受「一個中國」缺乏共識，也就是對於國家的基本定位和國家未來走向缺乏共識，¹¹¹由近年台灣對於國家認同的辯論來看，正顯示台灣人的國家認同並不穩固，甚至可以說台灣並沒有一個各方接受的國家認同，¹¹²以致於台灣在面對台灣主張主權態度始終不變的中共時，不知如何因應，而在此環境中，相對於逐漸統合的經濟事物範疇，國家認同的轉變因素，就自然成為台灣當政者左右兩岸政策制訂的重要參考依據。這種情況的發展，就是經濟因素逐漸統合，但國家認同的政治因素卻造成兩岸關係的緊張。

就如同行政院陸委會前主委蘇起所認為的，一九九〇年代初期的兩岸，在經歷了四十年的尖銳鬥爭後，「漢賊不兩立」的心態早已深入兩岸

¹⁰⁹ 根據中華歐亞基金會民國九十年十月出版，兩岸關係的結與解總結報告，第3頁：經濟國貿局在二〇〇一年一月公布，自一九九九年十月以來，我對大陸進出口連續時三個月的成長，二〇〇〇年十月我自大陸輸出金額五點六六美元、輸出二十三點五五美元，分別成長百分之二十九點九、及百分之十五點六。二〇〇〇年一到十月份，我對大陸貿易總額達二百六十九點九億美元，較前一年同期增長百分之二十九點六。陸委會在二〇〇一年四月公布相關的統計數字如下：自一九八七年至二〇〇一年四月，兩岸貿易總額累積達到二千二百九十二點五美元。一九九一年至二〇〇一年四月台商赴大陸投資金額累積達一百七十九點二億美元。一九八八年至二〇〇〇年十一月，大陸人民來台人次達六十萬八千七百六十六人。中共國台辦則公布，自一九八七年至二〇〇〇年十二月，台灣民眾赴大陸達一千八百六十萬人次。直接從海上赴大陸的台灣漁民則近百萬人次，台胞證發放總數近六百萬本，兩岸通婚亦達八萬對。

¹¹⁰ 陳水扁 2000 年當選總統後，以全民總統自詡，但不久國民黨籍行政院長唐飛辭職、約見國民黨主席連戰後又迅速宣布停建國民黨重要政策的核能四廠，九月間陳水扁拒接國統會主委等，使國民黨、親民黨結成聯盟抵制民進黨，而民進黨內部對於大陸政策亦紛紛擾擾，如民進黨籍立委陳昭南，而二〇〇〇年六月提案，要求民進黨全代會刪除民進黨黨綱基本綱領第一條「建立主權獨立自主的台灣共和國」相關條文，引起黨內爭議並被迫撤回提案，民進黨主席謝長廷表示台灣已是一個獨立的國家，她的名字叫做「中華民國」，未來不排除與大陸統一的說法等等。

¹¹¹ 中華歐亞基金會編印，兩岸關係的結與解總結報告，頁 10。

¹¹² 施正鋒，「台灣意識的探索」，頁 89。

人民的心中，很難撼動，但兩岸各自卻發生質變，台灣方面，蓄積幾十年能量的台灣民眾極渴望走出台灣，迎向中國大陸，李登輝接掌政權初年希望以創造性的政策來鞏固權力，又有一九九二年八月美國出售 F-16 高性能戰機的信心鼓舞；大陸方面則經歷了八九天安門民運的國際制裁與動盪，也希望用與台灣談判來營造和平氣氛，並吸引外資，雙方都有足夠誘因推動關係解凍，¹¹³所以才有九二年香港會談的基礎。

一九九二年，兩岸在前述「誘因」引導下，也為了解決因兩岸交流日益頻繁所衍生無窮的事務性問題，而在當年十月底至十一月初在香港舉行「海基會」與「海協會」會談後¹¹⁴，由國民黨政府主政下的「海基會」發新聞稿稱：「海協會在本次香港商談中，對『一個中國』原則一再堅持應有所表述，本會經徵得主管機關同意，以口頭聲明方式各自表述，可以接受。致於口頭聲明的具體內容，我方將根據『國家統一綱領』及國家統一委員會，本年八月一日對於『一個國家』含意所做決議，加以表達。」¹¹⁵並將此新聞稿傳送「海協會」，至同年十一月十六日，中共「海協會」致函「海基會」表示同意，這個「共識」，分別於一九九五年八月由時任海基會秘書長的焦仁和以「一個中國、各自表述」，¹¹⁶及陸委會前主委蘇起於台灣政黨輪替前的二〇〇四年八月，創造出「九二共識」加以描繪，¹¹⁷正因為兩岸在「一個中國」問題上達成模糊的共識，所以才可能在一九九

¹¹³ 蘇起、鄭安國主編，「一個中國，各自表述」共識的史實（台北：國家政策研究基金會，2002），頁序 III。

¹¹⁴ 於十月二十八日開始會談，但卻以「一個中國」問題未能達成協議，中共「海協會」於十一月一日離港，我方「海基會」代表等待至十一月五日，見中共代表無返回香港繼續會談跡象，使離開香港。

¹¹⁵ 有關國統會中「一個中國的意涵，是一九九二年八月一日所召開「國家統一委員會」第八次會議所通過，全文如下：一、海峽兩岸均堅持「一個中國」之原則，但雙方所賦予之涵義有所不同。中共當局認為「一個中國」即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將來統一以後，臺灣將成爲其轄下的一個「特別行政區」。我方則認為「一個中國」應指一九一二年成立迄今之中華民國，其主權及於整個中國，但目前之治權，則僅及於臺澎金馬。臺灣固爲中國之一部分，但大陸亦爲中國之一部分。二、民國三十八年（公元一九四九年）起，中國處於暫時分裂之狀態，由兩個政治實體，分治海峽兩岸，乃爲客觀之事實，任何謀求統一之主張，不能忽視此一事實之存在。三、中華民國政府爲求民族之發展、國家之富強與人民之福祉，已訂定「國家統一綱領」，積極謀取共識，開展統一步伐；深盼大陸當局，亦能實事求是，以務實的態度捐棄成見，共同合作，爲建立自由民主均富的一個中國而貢獻智慧與力量。請參閱：<http://www.mac.gov.tw/mlpolicy/china.htm> 網站。

¹¹⁶ 蘇起、鄭安國主編，「一個中國，各自表述」共識的史實，頁序 IV。

¹¹⁷ 蘇起、鄭安國主編，「一個中國，各自表述」共識的史實，頁序 VII。

三年四月的新加坡辜汪會談，並在隨後的兩年間不斷的進行事務性會談，也才有從九二年到九五年兩岸關係的緩和，但這種以模糊「一個中國」為兩岸緩和關係的基礎，卻在李登輝於一九九五年初訪美國康乃爾大學及飛彈危機後，迫中共於一九九六年十一月首次否認「一個中國、各自表述」共識，並指責我方違反一中原則，¹¹⁸扁政府更在主政第一年中，一直故意利用「一中各表」的模糊性與複雜性，混淆一般民眾的認知與記憶，二〇〇〇年立委與縣市長選舉時，直接宣布廢棄此一共識，以為二〇〇二年八月的「一邊一國」論鋪路。¹¹⁹以李登輝獨台路線為基礎的進一步激進，更將兩蔣時代秉持一個中國原則下的兩岸關係做出徹頭徹尾的改變。而這種將雙方默認模糊的「九二共識」策略加以明確化的結果，不僅是國家認同轉變的必然結果，也是造成兩岸關係不斷緊張的原因。

在陳水扁執政一年多後的二〇〇二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中共國台辦發言人李維一，在二〇〇二年最後一次記者會中公開宣佈，台灣應該儘快承認「九二共識」，回到「一個中國」原則的立場上，在堅持「和平統一、一國兩制」及「江八點」的基調上，鋪陳二〇〇三年兩岸關係¹²⁰，顯然，自陳水扁執政至二〇〇三年，中共對台政策仍是以「和平統一、一國兩制」及「江八點」為基礎，而回到一個中國是中共戰略上絕不撤退的底線，面對台灣國家認同由傳統的一個中國，逐漸向台灣獨立傾斜，若最終成為台灣主流民意，台灣執政者在此主流民意監督及支持下，讓台灣成為一個獨立自主，絕不追求現在或未來與大陸統一的國家，則兩岸關係的緊張關係不難想像，這種變遷，充分顯現國家認同因素在兩岸關係中所佔有的舉足輕重地位，也同時證明了台灣國家認同因素影響兩岸關係緊張與否的因果關係。

更何況，中國大陸在國際政治上以大國外交的模式壓縮台灣的國際空間，在經濟上持續發揮磁石效應，迫使台灣經濟不斷增加依賴大陸的局勢

¹¹⁸ 蘇起、鄭安國主編，「一個中國，各自表述」共識的史實，頁序 IV~V。

¹¹⁹ 蘇起、鄭安國主編，「一個中國，各自表述」共識的史實，頁序 II。

¹²⁰ 聯合報，中華民國九十一年十二月二十六日，版 13。

中，兩岸問題已從兩蔣時代的制度之爭，悄悄變成包含制度、文化、族群的整個國家認同的拉鋸，在某種程度來說，民進黨政府就是以國家認同這一意識型態，作為對抗中共的唯一武器，¹²¹讓台灣與大陸劃分清楚，甚至以台獨與否在國內政壇劃分，讓執政的民進黨得以經由族群認同為核心，外加文化認同及制度認同所建構的，不同於過去認為台灣與大陸都是一個中國的國家認同情境，讓主張台獨的民進黨得以繼續執政，並讓台灣保持不被大陸以政治、經濟的龐大壓力所屈服的獨立地位。

過去兩個最重要且執政的政黨，其大陸政策就透露出完全不同的思維模式，以至於兩岸的關係也呈現不同風貌，國民黨的中國政策，是透過漸進合作與兩岸和解，逐步降低中共對實質主權的容忍成本，經由對等實體落實台灣優先。民進黨的中國政策，則是透過台灣「主權國際化」和台灣「民族國家化」，逐步增加中國對台獨的鎮壓成本，經由國際承認落實一台一中。國民黨的作法是：一、消極上，減少雙方潛在衝突，如結束動員戡亂、承認中共治權、對外堅持一個中國、訂定國統綱領等，二、積極上，則是促進雙方互信與合作利益，如擴大交流、維持不定期對談等。民進黨的作法是：一、對外宣揚一中一台理念，推動以台灣名義參與國際組組織，試圖將台灣問題國際化，因此爭取國際社會支持，二、對內凝聚台灣人意識，同時推動新憲法、新國家、新民族運動，由此團結內部一致對外。基於兩黨各自的兩岸思維不同，以至於形成國民黨的作法，必須依靠中共的善意，而民進黨的作法則必須依靠國際強權，尤其是美國的配合。¹²²前已述及，中共的新民族主義正興盛的此時，對於美國介入中國的「內部事物」尤為敏感，自然造成國、民兩黨不同時期的兩岸關係，是較依賴強權抵制中國大陸的民進黨，比依賴兩岸相互善意的國民黨時期緊張了。但在二〇〇三年底，泛藍陣營在選票壓力下，也競相以承認台灣為獨立自主國家的基礎，向民進黨搶奪流失的票源，致使台灣國家認同的轉向台灣獨立，國

¹²¹ 楊羽雯，「弱者的武器」，聯合報，中華民國九十一年十一月十五日，版 15。

¹²² 郭正亮，「選舉總路線下的民進黨」，游盈隆主編，民主鞏固或崩潰：台灣二十一世紀的挑戰（台北：月旦，1997），頁 217～218。

民黨主張台灣必先獨立出中國大陸再決定未來統一或獨立的走向，最後也步上民進黨必須加緊仰賴美國支持的後塵，而與大陸進行國與國關係的鋪陳。依此推論，則兩岸關係的緊張，實在無法於短期內靠政黨再輪替（國親兩黨主政）就徹底化解，其最重要的原因是，台灣民眾的國家認同已然向台灣獨立於中國之外的一端大幅前進的結果。

兩岸的關係，若依據歷年來，許多學者與當事人提出各式各樣的終局解決方案，立場由純粹的「統一」到純粹的「獨立建國」，依序大概有以下幾種：¹²³

一、中國的一省：

定義明確，甚至有學者認為自一九四九年至一九七九年「中美建交」，及中共人代會發表「告台灣同胞書」之前的五十年，中共是以武力解放台灣為對台關係的主軸，¹²⁴中共要將台灣「收服」為中華人民共和國一省的基調明確。甚至蔣氏政府時代，尚且強調將台灣省作為復興中華民國的基地，兩相比較只是互相要將對方「收服」或「收復」為本身統治下國家的一部份的不同而已。

二、一國兩制：

此方案似較「省」的待遇為佳，有目前的香港做榜樣。其實，自一九七九年鄧小平訪美，首度申明以和平方式解決台灣問題起，隨後又有一九八一年「葉九條」中的第四條，確立「統一後」台灣制度不變的宣示，到一九九三年，中共國務院台灣辦公室，以七種語言發表「台灣問題與中國的統一」白皮書，明確表達中共對台的「一國兩制」政策。¹²⁵甚至中共現行憲法第三十一條，尚且規定國家在必要時可設「特別行政區」，以做為「一國兩制」的因應，顯見「一國兩制」是中共現階段對台政策的主軸。

三、聯邦模式：

¹²³ 請參閱由「雲程」屬名文章：「台灣求生存的深刻經歷」一文，張貼於：<http://taiwantt.org.tw/cdrom/20011215/content/200107/20010728-105.htm> 網站。

¹²⁴ 邵宗海，兩岸關係兩岸共識與兩岸歧見（台北：五南，1998），頁 41～42。

¹²⁵ 邵宗海，兩岸關係兩岸共識與兩岸歧見，頁 48～53。

聯邦就是以各州、省以州憲或省憲為基礎，參加或組成一個國家，各州、省擁有外交與國防之外的獨立權力。聯邦不得干涉各州、省的事物，且各邦、省派員監督國政。這模式北京堅拒如昔。主張者，以日本學者大前研一為著名代表之一。¹²⁶

四、國協模式：

以大英國協為範本，是個「主權國家」可自願性的加入與退出的制度，是北京所絕不能接受的。民進黨立委沈富雄，就曾認為國協模式是解決兩岸關係，並實踐李登輝「特殊國與國關係」主張的唯一選擇。¹²⁷

五、邦聯模式：

邦聯就是以獨立國家為基礎，參加或組成一個國家。參加的各國擁有獨立的主權。「邦聯」和「國對國」不同之處，是「邦聯」內主權國家的地位，是由互相承認而來的，可以出現「北京承認台灣而國際不承認台灣」的情形。而「國對國」的主權地位，是由世界各國承認而來，只要世界承認台灣，北京承認與否無足輕重。這種模式常被提及，美國馬里蘭大學教授丘宏達就認為，這是兩岸統一唯一可行的模式，甚至指明李登輝過去也不反對，陳水扁也同意作為思考的方向。¹²⁸甚至於二〇〇一年一月四日，國民黨主席連戰還發表新書「新藍圖、新動力」，在書中倡議，未來兩岸融合的方向，「邦聯制」是值得考慮的構想。¹²⁹

六、歐盟模式：

歐盟模式的主要基礎是各國國會所通過的平等條約。在此「國際條約」之下，各國的國名與政治制度不改變，但有關會影響互相的事物，不能一意孤行，須交出部份主權共同決議。歐盟模式的特點是參與歐盟的國家必須是民主國家，原因是唯有民主國家才能夠在經濟事務上有公平合理

¹²⁶ 請參閱：大前研一，趙家誼等人譯，中華聯邦（台北：商周出版社，2003）一書中相關論述。

¹²⁷ 請參閱：兩岸共組國協，「台琉同時廢武——實踐『特殊國與國關係』的方案」一文，張貼於：<http://www.drshen.org.tw/comment/post/880727.htm> 網站。

¹²⁸ 丘宏達，「從邦聯模式看兩岸關係和前景」，張貼於：

<http://www.future-china.org.tw/fcn-tw/200005/2000051611.htm> 網站。

¹²⁹ 潘錫堂，「從連戰『邦聯制』主張展望兩岸關係」，張貼於：

<http://www.npf.org.tw/PUBLICATION/NS/090/NS-C-090-073.htm> 網站。

的對待，這對以經濟共同體起家的歐盟至關重要。因為極權體制國家，經濟的利益並非由全民共享，而是由統治集團的相關人士所囊括；經濟政策繫乎一二人，對外之承諾不穩定，將影響歐盟全體的運作。北京一來不願民主化、不願放棄共產專政，二來無法容忍台灣和中國外交與國防各自獨立，三來排斥與台灣平等以待、更反對簽訂國際條約，故堅決反對歐盟模式。宋楚瑜在二〇〇〇年大選時曾推出，當時是爲了選舉考量，但隨選舉結束也掩旗息鼓，更未見相關政策的推動。另有學者張亞中，亦有類似提議。¹³⁰

七、德國模式：

德國模式，是兩個相互承認的對等國家關係，兩國各在聯合國各有席次，無礙的參與國際事務。學者張五岳有類似的提議。¹³¹

八、中華民國：

依據原始憲法的規定，中華民國的領域涵蓋了中華民國（台灣）、中華人民共和國（大陸）與蒙古人民共和國三國，這種架構明顯是以一國的憲法涵蓋三國，就知道其不可行之處。如一九九一年修憲前，有關國民代表大會、立法委員產生的規定，就是明確將政權來源賦予台灣與大陸地區，而爭議不斷。

九、中華民國在台灣（台灣中華民國）：

中華民國，透過「修憲」的過程，將其實質「有效管轄」區域轉化爲「主權獨立」的範圍，亦即變成「中華民國在台灣」（或台灣中華民國）。如：在一九九一年修憲後，支持台灣應該獨立者，就認爲在修憲後憲法適用上的效果之一，就是造成領土範圍及憲法實行地域的變更，簡言之，就是與原先國家成爲不同的兩個或多個國家之意。¹³²

十、台灣共和國：

¹³⁰ 請參閱張亞中，兩岸統合論，（台北：生智，2000）一書中之相關論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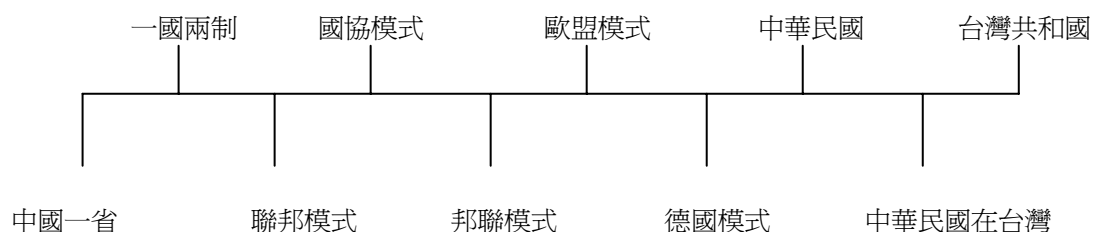
¹³¹ 請參閱張五岳，分裂國家的統一模式與統一政策之比較研究（台北：業強，1992）一書中之相關論述。

¹³² 黃昭元，「兩國論的憲法分析—憲法的挑戰與突破」，黃昭元主編，兩國論與台灣國家定位，頁14~16。

北京激烈反對，美國不支持，東亞各國也因怕戰亂而不支持。故，目前國際支持度低。這些比較激進的主張，以建國黨、台灣建國聯盟、世界台灣同鄉會等團體的主張為代表。

上述這些主張，若以光譜圖表加以表示，可以畫成：

圖 5~6 兩岸關係各種可能安排光譜圖



這些可能的兩岸關係定位，除讓台灣成為「一個省」或「一國兩制」的狀態外，其他都必須有台灣獨立自主或近似獨立自主的國家地位，才能與大陸建構各種關係，而「一個省」或「一國兩制」狀態，在過去與可見的未來，在台灣都無法獲得大多數民意的支持，在另一個面向上，台灣不論形式上與實質上都取得了國際法中的獨立國家地位，尤其在一九九一年經過修憲後更是如此，但檢視從兩蔣經李登輝到陳水扁的幾個時期所呈現的兩岸關係，顯示民眾逐漸支持台灣以獨立國家地位與中國大陸進行互動，並建構出特有關係是無庸置疑的，換言之，台灣主流民意目前只願在「聯邦模式」右邊的各项類別中與中共建構關係，面對台灣國家認同的變化事實，甚至有學者直指，統一已經不再是一個未來必然的結果，未來兩岸關係會奠基於「兩國、兩制」，以鬆散的聯邦、或以中國為名的某種形式的共同體形式，甚至讓台灣具有更大的活動空間，任何形式的兩岸關係都有討論的可能。¹³³

Samuel P. Huntington 認為，人們面對政治問題時，不僅著重其中利益的追求，更在保衛他們的自我認同，而自我認同並不僅僅在於瞭解本身「是誰」，更在於瞭解本身「不是誰」及「對抗的是誰」，¹³⁴才能回過頭來明

¹³³ Parris Chang, "Beijing's Policy Toward Taiwan: an Elite Conflict Model", in Chi Huang, Tun-Jen Cheng & Samuel S. G. Wu, eds., *Inherited Rivalry: Conflict Across the Taiwan Straits* (Colorado: Lynne Rienner, 1995), pp. 78~79.

¹³⁴ Samuel P. Huntington, *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and the Remaking of World Order*, p. 21.

確與鞏固自我的認同，在可能的兩岸關係安排中，中共開始要求台灣成爲其一個省，最遠只能給台灣「一國兩制」的待遇，而台灣對於自我認同的要求遠遠離開中共的一端，且有越來越遠的趨勢，中共爲了挽回這種趨勢不得不加強對台灣的壓縮，這讓台灣民眾不僅充分瞭解自己是誰，更瞭解不是誰及對抗誰的問題，兩者相互影響互爲因果而循環不已，使得兩岸在台灣國家認同不斷被逼迫朝台灣獨立方向前進的同時，兩岸關係的預判就再清晰不過了。

今日在老一輩兩岸高層領導人隨著時間的遞移而逐漸凋零的狀況下，兩岸對於國家統一的議題已經不再急迫，兩岸甚至都視統一僅爲一種象徵而已，而在台灣出生對大陸沒有特殊感情的台灣領導人，在兩岸未來發展的追求上，更不以統一爲唯一選項，甚至國民黨非主流派及國民黨以外的勢力還大力主張台灣獨立，¹³⁵因此兩岸分裂的時間越久，台灣國家認同轉變對兩岸關係的影響力量自然就越強烈。

早在十餘年前，就有學者指出，定位中共宜保持模糊化的原則，硬性的定位不是解決問題而可能是製造問題，並且在台灣內部引發新的政治不安，¹³⁶證諸過去的經驗，台灣早就因國家認同的爭議而不安多年，但台灣國家認同卻在爭議中不斷的向台灣爲獨立自主國家的國家認同方向前進，兩岸關係在國家認同逐漸轉變爲台灣獨立的大趨勢下，更必須明確的定義中國大陸與台灣的相對地位，使得兩岸關係更加僵持難以前進，這些例證又再一次證明國家認同因素，在兩岸關係理論建構中無法被忽略的重要地位。

兩岸關係理論，依據本論文中有關「文獻探討」一節得知，目前盛行兩岸關係論點，都欠缺完整「理論」(theory)的建構，而目前所呈現的五大類兩岸關係研究模式，其中包含有：「戰略三角」、「抗衡與扈從」、

¹³⁵ Steven Chan & Cal Clark, "The Mainland China-Taiwan Relationship: From Confrontation to Interdependence?", in Tun-Jen Cheng, Chi Huang & Samuel S. G. Wu, eds., *Inherited Rivalry: Conflict Across the Taiwan Straits*, pp. 53~54.

¹³⁶ 李英明，「定位中共的『現實』與『理想』」，趙春山編著，大陸政策與兩岸關係（台北：財團法人民主文教基金會，1991），頁 121。

「選票及大化策略」、「國際體系理論架構」、「分裂國家互動模式」、「統合理論」、「當前政治情勢探索」、「兩岸領導人及政策變換研究」、「政治心理學研究」等等論述，而這些模式或論述中，都欠缺探討台灣國家認同的因素，而國家認同形成主流後，在「選票極大化策略」壓力下，兩岸關係自然呈現不同的風貌。換言之，兩岸關係理論的建構絕不能忽視國家認同這個因素的存在。

